

中国草原的 过去与未来

中外对话报道专题集（一）

《中外对话》每天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和分析文章，并对以中国为重点的全球环境问题展开讨论。更多内容请浏览：

www.chinadialogue.net

中外对话、新浪环保联合出品
选取文章来自中外对话网站

 中外对话
chinadialogue

 新浪环保
green.sina.com.cn

前言

中外对话进行深度环境报道已经有五年多。在五年里，我们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研究者、实践者和媒体人士的鼎力支持，中外对话驻北京、伦敦、旧金山及印度的编辑们通过约稿或采访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

像记忆的流逝一样，这些精彩的特写文章不断被我们每个工作日发布的新文章所覆盖。但偶尔打开阅读，我们发现许多内容仍有借鉴和反思作用。我们不忍将其白白搁置，因此特地按内容分类，编辑成集，将这些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观点再次呈现给世人。

中外对话
2011年11月

目录

草原退化	2
移民与定居	10
治理之路	23
国外案例报道	31
开发与保护之困	42

封面图片提供：舒泥

草原退化

【编者按】

在中国大部分牧区牧民们近一二十年的记忆里，草原退化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活。舒泥的《草原上的沙尘暴》记录了曾经水草丰美的东乌旗草原的春天。沙尘暴成为春天内蒙古草原的主旋律，退化的土地从定居点向周围蔓延。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W·查德·弗特勒尔的《内蒙古：在黄沙统治之下》中提到：“草原正在丧失水分自然渗透和保持能力，导致了呼吸作用和蒸发作用速度的改变。”这对其他地区的降水也会造成连带性的影响。中外对话伦敦办公室编辑玛莉安·贝德的《简述：沙漠化和森林砍伐》是五年前的一篇旧文，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北方沙尘暴大范围肆虐的时期，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沙漠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

草原上的沙尘暴	3
舒泥 2011年5月27日	
内蒙古：在黄沙统治之下	5
W·查德·弗特勒尔 2008年4月7日	
简述：沙漠化和森林砍伐	8
玛莉安·贝德 2006年7月7日	



图片提供：周维

草原上的沙尘暴

舒泥 2011年5月27日

沙尘暴季节再次降临中国北方草原，牧民备受其难。舒泥回忆了她在内蒙古遭遇到的“沙漠之风”的经历

春天，北京的大风和扬沙天气又来了。在北京北方600公里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今年已经历了四次沙尘暴。

乌珠穆沁草原是目前内蒙古地区保存最好的典型草原之一，但这里也发生大面积草场退化。

城市里的人们讨论沙尘暴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从维护城市利益的角度出发实施许多治理措施，经过几年努力，北京的沙尘暴缓解了很多。但更广阔的地区，生态退化却在加剧。

2010年春天，我在东乌珠穆沁旗不幸遇到一场沙尘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住在东乌珠穆沁旗一户牧民家里。他家的儿子、媳妇都在城里，只有老夫妇在牧场上。那天风特别大，整夜都在呼啸，我醒来的时候，天很阴，有一点发黄，是起土了。天亮以后，风越来越大，外面的颜色渐渐变成灰黄、桔黄，最后天空和大地变成了一样的颜色。阿爸元登和额吉（阿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眼看天气越来越坏，他们穿上防风的衣服，带上风镜，阿爸去准备摩托车，额吉去拿套马杆，他们要去找羊！

草原上气候严寒，到了三、四月份，天气开始回暖，零下三、四十度的那种寒冷过了，人们就说是春天了，但是牧草还没有开始生长，草原还是黄的，还会下雪，温度也会降到零度以下。这时候在能见度很低的天气出去很危险，如果迷失方向，可能在野外冻伤或冻死。但是这么大的风，阿爸和额吉担心羊出事，他们还是骑上摩托拿上套马杆出去。出门前，额吉特别认真地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外面很危险。

所幸的是，那天下午下了一点雪，风小了一点，沙尘暴被压住了，额吉和阿爸平安回来了，羊群也没有遇到什么大事。阿爸那天下午非常不高兴，一直看着窗外发愁，沙尘暴已经预示着一年的坏年景。

在草原上沙尘暴有很多种，不同的沙子来自不同的地方，有黄沙子、白沙子、粗沙子和细沙子，但对牧民来说，简单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远方吹来的沙子，一种是本地的沙子。我在阿爸家遇到的那场沙尘暴就是本地的沙子。

草原上本地起沙子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农耕地在春天裸露在阳光下，草原上蒸发量大保不了



墒，风一吹就起土；第二种是草场退化，比如阿爸家门前这片草场，长期定居，牲口把门前都踏平了，风一吹就起沙子；第三种是河流、湖泊退化，干湖盆和干河床底都有很多沙子，会被春天的大风扬起，形成沙尘暴。但现在有了第四种起沙子的原因，就是露天采矿。

「那天风特别大，整夜都在呼啸，我醒来的时候，天很阴，有一点发黄，是起土了。」

阿爸家的草场为什么退化呢？先从阿爸家现在草场的情况说起。阿爸现在的草场是一个细长的长条，大约二至三公里宽，十几公里长。这是草场承包到户以后，很多地方承包到户以后分草场的方法。因为好草场的位置比较集中，每家都想分一点，不好的草场大家都不想要，所以承包时把好草场平分了，然后一直延续到很远的地方，以保证“公平”。分草场之前，牧民是游牧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集约经营的，分了草场之后，牧民就不能走动了，被限制在自家的长条上，定居下来。随着定居，蒙古包便捷、容易搬动的优势就消失了，房子成了大家的选择。

阿爸家也有一处房子，房子周围几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因牛羊的反复踩踏变得秃秃的。在冬去春来，草还没返青的季节，几乎就是露天的沙土。除了人定居，牛羊也定居了，房子离棚圈大约七百到八百米，在它们之间形成一个宽阔的退化带。在牧民定居政策刚刚推行的时候，就有学者指出，定居会造成“斑秃状”退化，现在阿爸家的周围就是非常典型的“斑秃状”退化。

我刚到阿爸家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情况，曾经问过阿爸：“您盖房子为什么不选一个草好的地方？”阿爸说：“我们这是老地方，以前过冬的地方。以前这草可好了！”草原上冬天是最难过的季节，气候严寒，羊羔、牛犊容易死亡，没有青草生长，所以

以前过冬的草场是最好的草场。但是现在已经定居十年了，这里已经看不出这种景象。

“现在不行了，春天沙漠风一刮，羊粪蛋全刮跑了，草就不行了。”阿爸称沙尘暴为“沙漠风”。关于“沙漠风”，阿爸叨唠过许多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沙漠风呀？”“一刮沙漠风草就变了，羊草不长，长灰菜，猪吃的那种草，到秋天一干什么都没有了。”“自己家的草场保护好没有用，有一家的草场坏了，沙漠风一刮就都坏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在我刚听到这些话时还是挺迷惑的，但是经历一次沙尘暴就知道了。

那天的沙尘暴结束后，我到门外做了点观察，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阿爸家门前秃秃的地面上有一层毛茸茸的草。额吉说，那是风把表土刮走了，草根露出来了。这是沙尘暴的隐形打击，阿爸家门前退化的土地下面还有草根，但是有了这场大风刮走表土，草根露出来，对草返青后的生长恢复很不利。

我在沙尘暴后的第二天清晨，试图靠双脚去寻找阿爸的那一群马。我向东走了几公里，发现东边的草地上落着一层沙土。我把它拍下来，回家拿给阿爸看，阿爸看了说：“这就完了！要长灰菜了！”灰菜又叫猪毛菜，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草原上牧草生长期短，春天不是牧草生长季，这一点需要务必注意，在春天大风来临的时候，青草还没有开始生长，不能覆盖定居后反复踩踏而露出土地的面。因此草原特别要靠多年生草本植物才能在漫长的秋天、冬天、春天持续提供草料和巩固表土，但是沙尘暴会导致一年生草本植物旺盛，多年生牧草退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过去，我们看到过一些说法，如牧民定居造成的斑秃状退化不太要紧，离家远的草场可以得到保护，矿山对土地的影响范围比放牧小等等。但问题不是这样的，沙尘暴会影响整个系统，造成全面退化，这就是阿爸说的：“自己家的草场保护好没有用，有一家的草场坏了，沙漠风一刮就都坏了！”

阿爸家所在的村子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划定草场，到2000年前后陆续定居，他定居的地方是过去草最好的冬牧场，现在那里退化了，而那里的退化会因为沙尘暴而影响更大的地区。

几天前，北方再次刮起大风，风依然是贴着地走，北京土不大，但是草原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在春天呼啸的大风里，总能想到阿爸忧愁的目光。

舒泥，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人与草原”项目志愿者，长期关注草原的自由撰稿人

图片为草原沙尘暴中的牧民，由舒泥提供。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18-Grit-on-the-grasslands>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318-Grit-on-the-grasslands>

内蒙古：在黄沙统治之下

W·查德·弗特勒尔

2008年4月7日

在一块风景令人陶醉的古老土地上，一片辽阔的中国草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正在化为尘埃。中国的发展和资源管理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W·查德·弗特勒尔报道。

亚洲的一块沙漠每年都在向北京移动，与之越来越接近，风沙遮蔽了天空，在内蒙古甚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环境难民和社会动荡。

“沙漠化不是一项自然功能”，刘登立说，他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新闻记者、研究人员，他还是环境保护媒介教育中国项目(EEMP)的主任，这是一家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已经成立10年了。“按照科学方法讲，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草原正在丧失水分自然渗透和保持能力，导致了呼吸作用和蒸发作用速度的改变。这影响了相对湿度，并且可能对其它地区的降水造成影响。”

“从社会和政治上来说，你们正在讨论的是早些时候——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所作出的政策决定。而现在，这些错误正在使他们切实地遭受痛苦，”刘登立补充道，自1979年以来，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必须应对那些年里所作出的决定。在内蒙古，这些决定已经造成了一些可怕的后果。在这一地区大片土地，植物已无法生长。”

当北京正在为2008年8月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的时候，沙尘暴和内蒙古草原的环境恶化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境科学家和农学家所优先考虑的问题。

7月的第一周，中国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国际草地与草原大会，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首府，是一座拥有230万人口的高原城市。2008年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草原科学家洪绂曾说，将使来自全世界3000名牧场专家集中关注内蒙古的环境、人口和工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正在把内蒙古的草原变成沙漠。

由于中国在推进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土地、水、社会和人群面临着污染、垃圾和资源减少，而这些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简而言之，扬沙天气明显是由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不理智的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所导致的。

中国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他一直是空气和水的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中国每年由于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大约为75万，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

中国也付出了经济代价。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保守地估计，每年中国环境退化的代价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8%。世界银行认为，每年水缺乏所导致的沙漠化的代价大概为31亿美元。虽然很多金融理论家预测，本世纪中国也许将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环境经济学家认为，为了维持如此高速度的发展，中国正在透支其自然资源能力，相反，中国将经历一场令人恐惧的生态崩溃。

扬沙已经引起了中国各阶层环境拥护者的注意。陈继群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画家，专攻风景画和人物肖像画。1967年陈继群20岁的时候，他去了东乌珠穆沁旗，那里位于内蒙古东部，距中国首都以北6万英里。

当时，内蒙古的风景有着惊人的美丽，未经开发。虽然总是刮风，土地干燥，但是大片长草一直铺向地平线，像天空下翻滚的巨浪。夏季短暂且炎热。冬季严酷，其标志是大风雪和刺骨的寒冷。数以千计的蒙古人——一个强壮、坚韧的民族——沿着游牧道路，自由放牧，从一个牧场到下一个牧场。

陈继群在这里居住了13年，一边作画，一边从事着不同的工作。这些绘画记录了陈继群学生时代的草原：辽阔的土地，骏马疾驰在羊群之间，河水泛起涟漪，岸边的青草有一英尺高，牛羊在吃草。

现在，这些记载着个人经历和记忆的绘画仅能存在于艺术幻想中了。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北方省份的草原正在消失，变成小型沙漠，慢慢扩大、彼此相连，形成沙海。在内蒙古的某些地区，70%的草原已经变成了沙漠。据保守估计，每年内蒙古都有1500到2000平方英里（大概3900到5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沙化。

草原沙化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作为中国的第三大省，内蒙古从东到西延伸1500英里（2400公里），在某些地方由南至北超过600英里（965公里）。据中国政府机构的估计，就在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的四分之三还是草原。内蒙古稀薄的土壤、每年15英寸（381毫米）的降雨量、以及游牧者养育着地球上最生机勃勃的野生牧场之一，这块草原生态系统的面积接近法国的两倍。

但是这一切都不再存在。据联合国估计，自从1980年以来，在中国北部，沙漠已经吞噬了200万英亩（81万公顷）农田、将近600万英亩（243万公顷）

牧场、和1600万英亩（650万公顷）森林。几乎四分之一中国已经是沙漠了。中国北方持续的沙漠化已经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

的国家推向了全球淡水危机的前沿。

毫无疑问地，陈继群所描绘的内蒙古景色——奔驰的骏马和流动的牧群——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这是采用那些试图控制沙漠扩展的无效的、充满争议的政策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强制游牧者和他们食草牲畜停止游牧。

然而，沙漠和沙尘暴仍在增加。陈继群的目标是帮助他认识的牧民找到解决沙漠扩张的方法。他相信，牧民有办法，这些方法是建立在数百年来所积累的土地和当地环境的知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过去40年北京所颁布的技术理论，其中很多失败了。

在土地已经焦干的地区，降水模式的改变导致了淡水严重短缺，这在沙漠化的扩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在根本的社会经济动力上达成一致并解决问题方面，中国的科学界、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却形成了分歧。人们努力采取各种方法来固定沙丘，包括飞机播种并种植了一道树木的绿色长城，它占地7400万英亩（3000万公顷），长达2800英里（4500公里），从东北穿过内蒙古一直到远东地区的新疆。

中国官员采取的相应政策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甚至互相矛盾。1994年，中国加入了新成立的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UNCCD）。两年之后，它发表了一系列管理计划，号召中国种植9500万英亩（3900万公顷）的草、灌木和树木，以在2050年前实现在19000万英亩（7700万公顷）土地上改善沙漠环境。

几乎没人相信这种方法能够保土固沙，陈继群对此尤其表示怀疑。“科学家们用篱笆隔开草原来进行他们的试验，但那是非自然的，所以在现实世界里不会起作用。”

虽然他承认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回忆起过去政策时他很痛苦。“他们到处种植白杨！草原没有树，那么他们怎么能认为白杨就是合适的呢？而且，在一个地区起作用的经验常常被作为模范经验，到处推广，不管降雨量、土壤和气候是否相同！”

其他政策影响了人类的行为，其中一些引起了强烈的争论。争议最大的是“生态移民”项目，该项目2001年在内蒙古启动，要求64万蒙古族、哈萨克族和藏族牧民从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草原迁移到城镇中来。

政府表示，这项强制运动的目的是减少过度放牧给草原造成的压力。但是蒙古人认为这项政策具有歧

视性，其目的是保证中国汉族的企业和移民更方便地利用水、矿产和土地。

这个迁移项目已经导致了频繁的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然而，目前几乎所有评估都显示，技术项目和政策项目都不能阻止沙漠，甚至中国政府的评估也是如此。每次回到内蒙古，陈继群都看到更多曾经长有草的土地暴露出来。沙地在扩张，小型湖泊和河流干涸了。

1998年，陈继群感到他必须有所行动了。“我不断地看到草原上有新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些从不曾从蒙古牧民的观点出发过。实际上，人们总是把牧民们当作造成沙漠化的凶手，而非受害者，”他说。

陈继群开始利用他的艺术热情，不仅是他积攒的感情、智慧和愤怒，还有专业视角和交流技巧。换句话说，他拥有一名活动家的素质。陈继群能够流利的使用中文和蒙古文。他文笔流畅，绘画娴熟。面对内蒙古人民的痛苦和环境的退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开创一个蒙古文和中文的双语网站——曾经草原，来发表蒙古牧民的意见。

“曾经草原”是一家形式自由的网站，发表图片和简短文字报道，介绍所发生的事情，其中充满了牧民的轶事，很多出自陈继群之手。这个网站引起了“自然之友”的注意，这是一家教育和宣传组织，1994年成立于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

梁从诫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教授、自然之友的共同创始人和会长，他本人对陈继群用文字和图片来描述内蒙古环境退化的工作很感兴趣。陈继群的报道和图片使他很快成为了内蒙古沙漠化问题的一流专家之一。

到2002年的时候，陈继群本人已经在组织由中国的学生、积极分子和感兴趣的市民组成的草原旅行团了。他还研究了涉及财产权、草原和沙漠化的法律。利用来自旅行团的收益和他自己的钱，陈继群开始翻译这些法律并发表在“曾经草原”上。

“当人民连法律都不能读懂的时候，中国怎么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呢？”陈继群说。最后，他在网站上加入了英文翻译，以提高国际上对内蒙古形势的关注。他频繁地在内蒙古旅行，其间向牧民散发了法律文本。

（……）“沙漠化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陈继群说。“但是，人们还没有听过蒙

古牧民方面的意见。我希望人们从牧民的观点来了解蒙古草原的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草原就没有未来。”

W·查德·弗特勒尔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专业的在读博士。最近，他完成了历时两年的关于采取跨国环境合作来阻止沙漠化并保护东北亚湿地的实地研究。

本文摘自“蓝色圆圈”发表的《黄沙统治之下内蒙古》一文。“蓝色圆圈”是太平洋研究所的一个项目，致力于研究地球上逐渐减少的淡水、清洁水的供应。本文获许在此转载。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876>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876>

简述：沙漠化和森林砍伐

玛莉安·贝德 2006年7月7日

在第五篇一系列有关全球变暖热门话题的背景介绍文章中，**玛莉安·贝德**写到，中国面临着一场复苏退化和不毛之地的战役。

沙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影响着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超过一百个国家的十余亿居民的生活。由于认识到了沙漠化的巨大危险，联合国宣布将2006年作为“国际沙漠和沙漠化年”。联合国指出，由于脆弱的干旱地区失去了生产能力，沙漠化中潜藏着毁灭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包括贫穷、饥荒和政治动荡。

认识到上述沙漠化与经济社会事务的关联，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召开之后，订立了《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公约中将沙漠化定义为“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这是第一个针对农村地区的贫困和环境退化问题的国际公约。根据联合国的说法，这个公约创造了很多项第一：第一个“承认一般民众中的能源利用者是决策的中心支持者和实行者”；第一个将当地妇女和男子一样都吸收到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强调需要整体性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机制来通过伙伴关系进行资源动员。（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该公约被作为在干旱农村地区消除贫困的一个关键措施。）

在宣布“国际沙漠和沙漠化年”的同时，联合国大会强调，为了在2015年之前实现联合国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加强对沙漠化及其影响的关注。其中的一项目标就是保障环境稳定。这个目标牵涉到众多的问题，包括在国家政策和规划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挽回环境资源的损失；将长期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数量减少50%；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住者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处于与沙漠化斗争的最前线。中国的草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草原的土壤受到过度放牧、干旱、开矿和其他各种形式开发活动的侵蚀。造成沙漠化情况不断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森林砍伐——原本森林茂密的地区变成了不毛之地，其原因分为有意的（如由采伐、农业和大坝建设造成的）和无意的（如由山火灾害造成的）。树木的根系对于固定土壤至关重要，如果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将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土壤流失和洪水等后果。

在中国，大家已经认识到沙漠化问题的重大。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沙漠展望》中指出，“长



江源头的植被破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洪水问题”。“现在需要花大力气来处理黄土高原巨大的水土流失问题，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在陡峭的山坡上所进行的密集的农业活动”。黄土高原位于中国西部的沙漠和华北平原之间。由于水源涵养遭到破坏，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控制地下水位，一个是直面广大平原的盐碱问题。

中国已经有2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化所吞噬，几乎占到了国土的三分之一。

根据新华社2006年5月的报道，由于气候变化，青藏高原（即“世界屋脊”）的冰川正在以每年7%的速度退缩。中国科学院的董光荣教授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指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后退，高原正在变成沙漠，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干旱和沙尘暴。董教授在其研究中使用了中国681个气象站四十多年的数据。中国国家气象局的韩永祥（音）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9摄氏度，导致了冰川融化的加快。

从2006年2月开始，北京沙尘暴的严重程度不断刷新5年以来的纪录。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戈壁沙漠每年扩大大约950平方公里，越来越逼近首都。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与沙漠化斗争的十年计划，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绿化地带来保护北京。政府计划建立起一个总长达到2,800英里的防护林网，总共有数十亿棵树木，以制止沙漠的侵袭。这些林带被形象地称为“绿色长城”，因为它与数百年前修筑的抵御入侵者的长城非常相象。

中国政府指出，中国已经有2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化所吞噬，几乎占到了国土的三分之一。但是，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在200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妇女与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沙漠面积正在以每年7,585平方公里的速

度缩小，相比之下，上个世纪末则是以每年10,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

另一些人则并不这么乐观。设于华盛顿的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认为，一个覆盖了整个华北的尘暴区正在形成，这“是世界上肥沃土地变沙漠的一个最大的例证……尽管到处都是试点项目，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从总体上来控制情况。沙漠正在不断扩大。”布朗还指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来自中国的沙尘已经被带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太平洋环境组织（该组织致力于环太平洋地区的生活环境保护，主要通过提高一般民众参与性、加强交流和改革国际政策）对于宏观的情况也十分担忧。该组织指出，“中国农民由于土地干涸而颗粒无收的状况，将迫使该国转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食品进口国，这将会给美国和加拿大等谷物生产国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祝列克表示，中国在沙漠化治理上所要做的工作“仍然艰巨”，尽管每年的投入已经达到了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但要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能够治理”的沙化地区（共53万平方公里）全部恢复原状，是十分困难的。他还说，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2385亿元（相当于298亿美元）。

祝列克说，政府在沙漠化治理上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难，这使四亿人口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40亿元（相当于67.5亿美元）。他强调，在环境脆弱地区，过度放牧（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度增加）、过度采伐、薪柴燃料的收集以及其他的人为活动仍然在不断发生，另外，全球变暖也使得沙漠化的趋势进一步向前推进。祝列克说，这一仗必须要打，办法就是完善法律制度、对破坏环境者予以严惩及加强国际合作。

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总工程师杨维西在2006年4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指出，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未来仍将是沙尘暴的源头，我们不能期望问题能在一夜之间消失，这不现实。”

在四月份的一周之内，大风给北京刮来了30万吨的沙尘，把屋顶变成了黄色，居民们不得不戴上了医用口罩。同时，华南地区发生了洪水和泥石流（由暴雨引起，有时会因森林砍伐而加重），造成了多名人员死亡，并迫使许多人逃离家园。中国的气象研究表明，在过去的40年中，该国的气温已经在不断上升。世界观察研究所预测，“专家认为到2015年，‘北旱南涝’的天气模式将会崩溃，原本多雨的长江以南地区的降水量将会减少，而中国北部的

降水量将会增加”。但是该机构又谨慎并担心地补充说：“不过，这种预测也可能改变，因为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玛莉安是一位驻伦敦的记者

图片来自：天下溪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73>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73>

移民与定居

【编者按】

中国为改善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的努力从未停止。在近十年，政府推行的各种生态政策中，“生态移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而以改善生活、推动经济为目的的定居工程、城镇化建设，则随着草原经济和政策发展加速进行。这些政策改变着许多草原地区牧民的生活。

自2006年至今，中外对话对草原移民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报道。周季钢2006年的《阿拉善的生态难民》和冯永锋2008年报道的青藏高原生态移民，反应了大部分草原牧民面对移民政策的困惑。乔纳森·沃茨在他的《正在消失的藏区草原》中，讲述了玉树地区牧民在移民和放牧两种选择之间的挣扎。冯永锋的《当草原要吃掉森林》讲述了四川西部由“牧民定居工程”带来的森林砍伐，造成被迫移民者更深切的不满。生态脆弱地区定居、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不只出现在中国，《克什米尔的城市丛林》从更全面的角度做了阐释。

阿拉善的生态难民	11
周季钢 2006年12月6日	
正在消失的藏区草原	13
乔纳森·沃茨 2010年9月22日	
青藏高原生态移民的困境	15
冯永锋 2008年10月2日	
当草原要吃掉森林（1）	17
冯永锋 2011年6月22日	
当草原要吃掉森林（2）	19
冯永锋 2011年6月22日	
克什米尔的城市丛林	21
亚瑟·帕维兹 2011年5月20日	



图片提供：天下溪草原游学、常青

阿拉善的生态难民

周季钢 2006年12月6日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阿拉善从牧区向城镇的移民工作致使大量牧民陷入贫困。周季钢对当地城镇能否容纳如此大就业量以及快速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害提出了质疑。

2006年8月27日,阿拉善左旗刮起沙尘暴。这是立秋以来阿拉善的第一场沙尘暴。作为亚洲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阿拉善近年来深受世人关注。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阿拉善荒漠化土地面积由1996年的92.71%上升到2004年的93.14%,增加了0.43个百分点。每增加0.1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200多平方公里的劣质土地。分布在阿拉善境内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三大沙漠日渐连成一片,在阿拉善左旗境内有3处“握手”、阿拉善右旗境内有4处“握手”区域。

阿拉善盟林业治沙局局长范·布和说:“人口的增加、牲畜的增加、农业的过度开发,是阿拉善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

历史资料显示,阿拉善人口从解放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2005年末的21.2万人,增加6.1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的增长。解放前宁夏军阀征兵,以及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饥荒,是大量外族移民迁入阿拉善的主要原因。

外来民族的冲击使得阿拉善原有的草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增加促使了牲畜的增加。按照阿拉善目前的自然条件,全盟草场最佳承载量为70万羊单位。据2006年7月全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阿拉善有200万羊单位。

牧民们认为,官方数据并不足以采信,应该有少无多。譬如阿左旗贺兰队在1990年代养羊3万只,而政府的统计报告却只显示了1万只。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并恢复生态,自1989年阿拉善左旗西滩和漫水滩开发建成之日起,阿拉善陆续展开规模庞大的移民搬迁工作,并在移民迁出区实施禁牧。1995年1月,时任盟委书记伏来旺提出“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的“转移战略”,明确了从牧区移民向绿洲和城镇聚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思路。官方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盟已搬迁转移牧业人口5676户、19082人,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继续搬迁牧业人口6520户、21754人。以全盟2005年末21.2万的人口计算,截至十一五末,阿拉善将总计实施生态移民40836人,约占总人口的1/5,占牧民总量的4/5。



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却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阿拉善生态移民导致了大量牧民陷入贫困。

1999年,阿左旗政府作出了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实施退牧还林、移民搬迁的决定,共搬迁转移牧民1500户6000人,转移处理牲畜23万头,退耕3500亩。

牧民每人从政府处获得500元的安置费,贺兰山上被拆的羊圈一座补贴1000元,拆掉的砖房每平方米补贴140元,土房100元。一二期移民政府4.95元/亩/年的补贴,补偿期限为5年。2001年开始的第三期搬迁,每亩土地牧民获得国家补偿11斤陈化粮。退牧搬迁之后,由牧民变为农民的移民最大的收入就是种植庄稼获得的农业收入,综合收入仅仅为禁牧之前的1/3。

记者来到苏木图嘎查(嘎查相当于乡)所在的移民区,牧民图木巴特正在院子里转悠,伺候着满地跑的几只小鸡。图木巴特说,自2005年退出草场后,家里卖掉了400多只羊,依靠政府的补贴过起了“闲民”生活。他全家7口人,每年可拿到十万多元的补偿款,补偿期为5年。

“5年之后呢?不让放牧了,也没有地种,政府也没有安排什么就业,我们只有闲着,养几只鸡鸭。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嘎查里还有好多。”图木巴特对往后日子表现出担忧。

阿拉善盟党校经济学副教授杨牡丹着重强调了移民回流甚至沦为游民的问题。一份名为《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阿拉善约有3.4万牧民处于贫困线之下,0.47万牧民处于绝对贫困水平,许多地区已失去人畜生存条件,有2万多牧民沦为生态难民现已迁入他乡。

阿拉善盟副盟长龚家栋承认:“只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给予妥善解决,才是成功实施搬迁转移的重要保证,仅以经济补偿进行安置是行不通的。”

业以接受移民就业。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城镇集中”。与此同时，阿拉善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动愈发明显。

阿拉善盟环境监测站站长陶格日勒表示：“阿拉善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年均达到30%的增速。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按照阿拉善盟十一五规划所言，在未来的5年中，还将有21754人沦为生态难民。杨牡丹认为，按照阿拉善的现有经济水平，能否容纳如此大的就业量，是一个问题。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又致使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在被视为阿拉善工业重镇的阿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因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途中，公路沿途曾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

该如何反思阿拉善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得失呢？

刘书润坚决反对草场围封转移，认为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

“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羊吃七百种草，牲畜吃草、踏草，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也是一种绿色消耗。而且，围封之后的草场没有牲畜粪便的浇灌，多年下来，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将促使物种单一化。

刘书润指出，各种不合时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本原因在于小农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贬低，不经思考的移植汉族经验，并在阿拉善强行推行，只能说是政府的无知，是主流发展观的泛滥。刘书润甚至提出，游牧文化是阿拉善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草原地区应该发展游牧以期社会重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邓仪表示，“多少年来政府保护生态不遗余力，但你可以发现一点，当人和自然隔离开来，对自然进行恢复的时候就很有效果，拉一根铁丝网，理论上铁丝网围住了，牲畜对自然的压力就减少了。实际上，铁丝网是死的，人是活的，骆驼是大的，羊是小的，那么就是说，改变不了人，牧民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所有的治理也只是一个秀而已”。

该协会副会长宋军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上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推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也是项目执行者，却

不是环保的利益主体。

宋军提出生态保护应该产业化，确定利益主体——政府充当出具优惠政策，生态保护由市场化主体实施运作，同时也让牧民参与进来，成为生态产业的受益者。

周季钢，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时政问题，擅长深度调查报道。他的有关包头核污染、中国大陆地下性产业等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605-Alashan-s-environmental-refugees>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605-Alashan-s-environmental-refugees>

正在消失的藏区草原

乔纳森·沃茨 2010年9月22日

科学家认为高海拔地区草甸的荒漠化正加剧气候变化，并将对该地区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乔纳森·沃茨访谈了那些亲眼见证这些变化的牧民。

这里是世界屋脊，在这片广袤的高山草原上，像祖祖辈辈的藏族牧民一样，彭措多杰以放牧牦牛等牲畜为生。

但是最近几年，不断升高的气温、过量的牲畜以及昆虫与鼠类带来的疫病破坏了他的家乡——青藏高原的植被。

人们在讨论全球变暖问题时很少提起高海拔地区的草甸，但这片土地的变化对藏区乃至世界的生态安全都至关重要。

这个问题对彭措多杰而言更现实。头顶的云卷云舒他已习以为常，脚下草原的变迁却让他手足无措。

“以前草长到了这儿，”彭措一边说，一边将手比在膝盖下面一点儿的高度，“二十年前，我们还不得不把草割掉。但是现在，您自己看。现在草这么矮，像苔藓一样。”

他的帐篷周围曾经满是绿色的草原，而现在这里几乎都是黄褐色的沙漠。如今的草原只是一片砂石质的布满了鼠洞的秃草地。

这片几乎是美国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高原的大多数区域状况都是如此。

科学家称高海拔地区草甸的荒漠化正在加剧气候变化。如果没有这一层草皮覆盖，世界屋脊将逐渐丧失涵养水分的能力，并将散发更多的热量。

也因为如此，藏区山峰的升温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至三倍；世界第三极的永久性冻土与冰川都正在消融。

更糟的是，许多环绕高原的高峰，诸如昆仑、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山脉，就像输送水汽的喷头——但他们对温室气体的“贡献”会胜过二氧化碳——现在正慢慢地达到气温的高点。这使欧亚大陆被棕色的云团笼罩，这云团中汇集着来自印度或别处的污染物、灰尘与黑色煤烟。当永久性冻土开始融化的时候，会大量释放甲烷这种强劲的温室气体。北京气候中心的主任肖子牛说道，纵观整个亚洲，西藏的气候是最敏感的也是对全球影响最大的。



从玉树到西宁的两条交织的公路沿线，草原退化很明显，这条路线正穿过三江并流国家风景名胜区，这儿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上游。沿着公路我们能看到一些地方如此贫瘠，不像高山草原，倒像是戈壁沙漠。

「青藏高原并没得到足够重视。

人们称其为第三极，但实际上它比南极北极更重要，因为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更紧密。」

彭措多杰是留守在这片环境最恶劣区域的为数不多的牧民之一。他说：“这块地方曾经有五户人家。现在我们是唯一坚守在这儿的，但也没有多少草可以养活我们了。这里越来越干燥了，每年老鼠也越来越多。”

仅仅在10年之前，离他最近的城镇玛多，因为发达的牧业、渔业和矿业而曾经是青海省最富裕的地方，但是当地居民说他们的经济随着附近湿地的枯竭而萎缩了。

“这儿本来是一片湖泊。那个时候连条路都没有。吉普车都开不过去。”我们的藏族向导达朗吉日对我们说。据统计，这片牧场如今有70%变成了沙漠。

“玛多现在非常穷了。根本就活不下去。”一位自称安岗的藏族老师说着，“矿挖完了，草原也毁了。现在人们只靠政府救济，每天就坐在炕上等下一笔钱。”

当地许多人都曾经是牧民，后来在2003年的“生态移民”政策中定居了下来。中央政府正致力于重新安置青藏高原上225万牧民中的50%至80%。据国家媒体报道，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恢复草原、禁止过度放牧及提高生活水平。

青海遍布着安居工程点，还有更多新社区正在建设中。牧民每年每户能收到一笔年 三千到八千元的补贴，能得到住房，但得承诺十年禁牧。而与美国和加拿大的保留地居民一样，这些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许多人最后要么就一直失业、要么就去从事回收垃圾或者清理粪便的工作。

有人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我还能变回牧民，那就太好了。但是土地已经被政府拿走了，牲畜也已经卖光了，我们无路可走。没有希望了。”玉树安置中心的一位居民尚拉世（音译）说道，“他们答应为我们提供工作，但是并没有工作可做。我们靠每年三千块的补贴过活，可政府的人又把这笔钱克扣了说是房租，但这些房子本来说都是免费的。”

今年玉树地震之后，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新建的房屋垮掉之后，人们几近崩溃，他们生活在草原的时候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劫难。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帐篷生活——但是在救灾帐篷中，没有地也没有牛羊。

由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当局拒绝在官方层面上回答《卫报》的提问。而私下里，一些官员认为移民工程与恢复草原（包括修建围栏）等工作都还是值得做的。

“过去五年里，情况还是得到一些改善。我们在七个区域开展工作，种了很多树，希望在那些废弃的金矿附近重塑生态系统。”一位环保部门的官员说。而短时间内并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区域尤其脆弱。一旦草原被破坏，几乎很难再恢复。在高海拔地区很难人工植草。”

这个工程的作用也被很多人质疑，包括NGO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创始人汪永晨——十年来她是高原的常客。“过度放牧被认为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但是禁牧和移民之后事态也并未好转。我认为气候变化与开矿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大。”

一些政治敏感因素让这一项目的评估变得复杂。过去一年，三位卓越的藏族环保人士由于揭露当地官员腐败及在高原上捕杀野生动物而相继被捕入狱。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说这很难评价。“情况很复杂。有些区域的草场正在好转，而有的反而恶化了。这其中的因素很多。”

持续增多的鼠兔、沙鼠、老鼠以及其他啮齿类动物也成为草原退化的凶手，它们到处掘洞、啃食草根。

动物学家们说这正显示了生态系统如何迅速失去平衡。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十年内惊人地激增，因为它们的天敌老鹰、豹子等都被捕杀殆尽。直到很晚之后，政府才开始保护野生动物，竖立钢铁柱子以替代被伐倒的树木，以此来吸引猛禽筑巢。

需要对这片影响气候的重要区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各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青藏高原并没得到足够重视。人们称其为第三极，然而实际上它比南极北极更重要，因为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更紧密。”一位环保人士、探险家杨勇（音译）说。“这个地区需要大量的深入调查。冰川与草原的变化非常迅速。草原荒漠化问题在高原上已经非常明显。这是敏感生态系统的反应，出现得比任何地方的都早。”

彭措多杰不会参与任何调查研究。但他所看到足以让他对未来感到悲观。“天气也在变化。以前夏天雨多、冬天雪多，四季分明，现在不是了。一年一年气候越来越干燥。如果情况继续下去，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补充报道：崔崢

来源：www.guardian.co.uk/

卫报新闻传媒有限公司2010年版权所有

图片由 lapin.lapin 摄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828>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828>

青藏高原生态移民的困境

冯永锋 2008年10月2日

来自生态退化的青藏高原的许多牧民期望移民到城镇后生活会有所改善。但迁移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失望，冯永锋写道。

青藏高原的草原持续退化，中国政府认为当地牧民的牛羊是最大的破坏者，因此从2003年开始一项浩大的工作，把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许多牧民迁移到城镇边缘，以给草原喘息的机会。但中外对话的记者发现，如果“后续产业”问题不解决，这些生态移民的生活将越来越艰难。

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总投资6.31亿元，计划移民16129户，89358人，涉及青海十多个市县和自治州。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已实际移民超过1万户，将近6万人离开了家乡。移民大部分搬迁到县政府所在地的郊区，由政府统一提供住房和生活补贴。

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外来者”

沿着蜿蜒的聂恰曲河往西走，便是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县”的治多县，著名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就在其辖区内。治多县索加乡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不仅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也是长江上游通天河的主要水源涵养区。作为“生态移民”计划的一部分，治多县从2005年开始，把一些牧民从索加乡移到了治多县城旁边，从而在县城边形成了一个将近200户的“移民村”。

治多县城不大，但移民村与县城仍隔着一小段距离，这让移民村的人与县城本地人产生了心理距离。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扎多（全名：哈希·扎西多杰）曾经是著名反盗猎英雄索南达杰的助手，作为“藏羚羊的保护神”，他曾获得2006年度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公益奖。

从索加乡搬到治多县城边的人，不是扎多的亲戚，就是他的朋友。记者随着他一家一户地拜访了这些移民。政府提供的移民村房屋都盖得一模一样，每家院子中都有一口新淘出的井，房子中间有个炉子，这便是给移民们配置的全部家当。每户每年的政府补贴是6000元人民币（约900美元），另外再补1000元的牛粪费（燃料费），连续补10年，之后愿意搬回老家的，可以再回去。

青海省格尔木市南郊的“昆仑民族文化村”，主要接收来自“黄河第一县”曲麻莱县的生态移民，两个乡7个村约240户人家迁居在这里。他们和治多县的生态移民一样，住在城市边缘，却不是城市人口。虽然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城镇学校上学，他们可



以到城镇的医院看病，但在心理上，他们还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行政上也属原来的乡政府管辖。

在这里什么都要买，而在牧场上，我们需要买的东西很少，牛羊什么都给我们提供了。

生态移民的生存状况堪忧

才仁洛桑原来是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的村长。2005年，他和许多村民一样，一听到移民的消息，觉得很高兴，因为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城市里更便利。可移下来后，他发现一家人今后的生计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什么都要买，而在牧场上，我们需要买的东西很少，牛羊什么都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在老家烧牛粪，这里烧的是煤和天然气；我们在老家到河边打水，这里用自来水，可一天只供应1个小时；我们在老家随便可以上厕所，不会有什么污染，这里倒是安装了抽水马桶，可由于没有水，抽水马桶根本没法用。”

让他更担心的移民村今后的出路，“大家到这里住着之后，卖掉了牛羊，拆掉了房子，牧场交给了国家。可下来之后，我们都找不到工作，许多家庭全家成天在家闲着。”

格尔木原来很少有藏族居住，因此南郊的移民村在当地显得格外的惹眼。按照“规划”，这个村子有许多公用设施，可大部分没有建成。2006年搬下来时建好的垃圾收集坑，由于一直没有人把垃圾运走，很快就填满了，发出恶臭。村民没有办法，只好在一个空地挖了个大坑，把垃圾扔到这个大坑里。

困难重重的“后续产业”

曲麻莱县、治多县、格尔木市一直都在关注移民村

的发展，希望把“后续产业”做好。有时候政府也派出调研组，希望找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但受困于资金、技术和方法，突破口至今没找到，移民经常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曲麻莱县一位领导干部认为，牧民搬到城市边上，他们本身就是极好的“旅游资源”，应当在格尔木市、曲麻莱县等城镇边的移民村里，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吸引城市居民过来旅游，“把高原马牵起来，把藏族舞蹈跳起来，把牧民帐篷搭起来”。昆仑民族文化村真有移民投资建设了几个帐篷，从移民中招收一些青少年当服务员，唱歌跳舞给客人看，但开业之后游客很少。

移民村里随便走上几步就会遇上一个小卖部，毕竟这是最不需要特殊技能的谋生手段了，但生意都十分清冷，难以维持下去。有些村民实在找不到出路，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替没有移民的人放牧，一年也能得到少许的收益。

昆仑民族文化村曾办了一个嘛呢石雕刻厂，本来想卖给游客的，可一来游客稀少，二来石头相对笨重，结果大多数都滞销了。又想办一个服装厂，可由于资金缺乏，启动也颇为困难。

扎多的新思路

作为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副秘书长的扎多，比别人有更多的担心。他不知道，移民村的村民们能否真正融入城镇的生活；而10年之后如果重回草原，移民们又是否还能适应原来的生活。

他说，实际上，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尤其是宗教传统对于环境是相当友好的，藏传佛教提倡尊重生命和自然，其“神山圣湖”的教义与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契合。用藏族传统和文化来号召当地牧民与种种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作斗争，牧民们会非常容易理解和拥护。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和“保护国际”组织这几年的合作也证明了这种保护方式非常有效。

“如果当地人能够成为当地的环境守卫者，在不移民的情况下实现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不是还一定要把他们搬下来？”也许，这也是解决目前移民困境的一个新思路。

背景知识：

三江源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位于中国西部、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总面积为30.25万Km²，现有人口55.6万人，藏族人口占90%以上，其他还有汉，回，撒拉，蒙古等民族。

历史上，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密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的高原草甸。但近几十年来，冰川、雪山逐年萎缩，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涸，沙化、水土流失的面积不断扩大，荒漠化和草地退化问题日益突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受威胁的生物物种占总类的20%以上，部分地区的人类已难以生存，被迫搬迁他乡。

冯永锋，《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445>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2445>

当草原要吃掉森林（一）

冯永锋 2011年6月22日

四川省帮助藏族牧民建新房大量伐林引起当地人的愤怒。环保活动人士冯永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五月，中外对话曾报道过环保草根行动者保护中国四川西天然林免遭砍伐的文章。冯永锋，记者兼中国环保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创始人，曾在德格县参与过此次活动。在本文中，他报道了这片土地上的状况以及当地人民的反应。

达娃卓玛每次回家，那四川德格称为“麦宿”的地方，都会满怀期待，家乡那有一大片森林在迎接她。她在收集家乡的歌谣，她知道，如果没有森林，这些歌谣不可能通过人的嘴唱出来，歌谣就像森林里流出的水，必须有树木的庇护和滋养。

而几个月前，达娃卓玛回家的时候，先是惊讶，后是愤怒，那期待中的森林似乎迁徙了，一路上，路边全是倒下的大树。油锯在几十秒钟之内，就能够让成长了数百年的云杉、冷杉倒地，又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把它剁成一截一截。

接着，“东风天龙”大卡车就开来了，这种车的车厢极大，能装好多棵树。人们在几十分钟之内，就把树装满，然后运到了那些没有树的地方，盖房子，做家具。

达娃卓玛的乡亲们与她一样惊讶。2010年初，一些像抢劫犯似的队伍开进了沟里，他们在几个月之内，每天勤劳地砍树、锯树、运树。

德格县的所有树，都长在陡峭之山，易碎之山，树一倒下，山体就像中了弹的人一样滑落下来，成堆成堆地滑进河里，阻塞道路，制造灾难，酝酿泥石流和瞬间洪水。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德格县麦宿地区的人们忍不住了，他们集结起来，冲进砍树集团，毁弃了他们的油锯，喝止了他们的砍伐，把所有人赶出毁林现场。

然后在入口处，修建起了一个简易的房子，在路两边，钉下两根木桩，架起一道非常简陋的栏杆。这就是村民自发建起来的木材检查站。麦宿地区从行政上说有三个乡：普马、达玛和岳巴，这三个乡每天派出三个人到木房子里值守。没有他们的同意，一棵树都无法运出去，一辆运木头的车也无法开进来。2010年6月份以来，10个月过去了，他们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哪怕要我死，也不能让木头运出去。”

麦宿地区是一个文化上的称呼，生活在这个地方的



人一直以自己良好的文化传统而自豪。这个地区大体沿着一条绵延几十公里的山沟分布，山沟两边当然是山，山顶上每年都会有积雪覆盖，山上永远长着树；中间是河流，河边有些土地，种着青稞、土豆和圆根。麦宿地区有德格当地非常有名的“民居”，吸引着游客和文化爱好者的目光。其实更有名的是里面的寺庙，像宗萨寺和宗萨寺的佛学院。同样有名的是这个寺庙的藏医院，它继承着德格一带藏医院的良好传统，精心研制着各种藏药和治病良方，虽然有很多药没有得到正式的批文，但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延续着药物的开发，延续着救济众生的能力；这两年，藏医院实现了重建，不久，住院部也将修建起来。麦宿地区的藏香也非常有名，藏香里面，也藏纳着一些适合燃烧的藏药。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德格县麦宿地区的人们忍不住了，他们集结起来，冲进砍树集团，毁弃了他们的油锯，喝止了他们的砍伐，把所有的人赶出了毁林现场。

生育、滋养达娃卓玛的麦宿地区，是藏族三大文化中心“德格文化”的一根有机枝条，另外两个中心分别是西藏拉萨和甘肃夏河。德格的阿须草原是格萨尔王的出生地，为此当地有许多英雄的遗迹和传说；德格印经院又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集成和传播地。而德格的寺庙、传统、藏医药等，更是让当地人生生不息地引以为荣。

藏族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总是生活在现实之中。当我们追溯其过去的美好之时，我们发现，其实这些美好仍旧在现实中时隐时现。从环保角度来说，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地方的人能够像藏族那样，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之后，清晨起来，会发现这片土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容颜还是当年的容颜，信仰还是当年的信仰，山水还是当年的山水，阳光还是过去的阳光。

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还是当年的态度：当有人伤害自然界时，人们会起来替自然反抗，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界与自己，是完全一体的。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成为自然的保卫者。

麦宿的人们相信他们没有理解错。2010年春天，当砍树大军进来的时候，他们听说砍树是为了给贫困的人盖房子，他们相信了，也认同了。为了解救贫困，砍自己胳膊般的大树，他们还是深明大义的。

让他们变得怀疑和忧惧的是两个现象，一是砍树的办法太粗暴了，路边的、陡坡上的全都被砍；越是大的树越被砍得快。二是有人到那些盖房子的地方看过了，他们发现，给“贫困的人”盖的房子，里面几乎没有木材，绝大部分都是水泥和石头。

既然“给贫困的人”盖房子用的木材很少，那么砍下的木材被运到哪里去了？疑心让他们开始听信传说，有人说运到成都、昌都去了，有人说运到玉树、西宁去了，反正，木头没有被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一些负责砍木头的老板所言所行，更让他们听了心惊肉跳，这些老板扬言说，整条沟里山上的所有的树，都已经被他们买断了，要在三年内，全部砍光。

把树砍光？这是当地人从来没想过的事。他们平时烧火，用的都是掉落的枯枝。修房子，砍棵树，也是一再地对山神、树神忏悔；看到有领导干部端着枪要来打野生动物，他们更是不惜下跪，苦苦哀求，希望其能回心转意，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要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

麦宿地区的人听到的“贫困的人”其实是“木材贫困者”，是指那些在草原上生活的牧民，四川省要他们定居下来，要给他们盖房子，可草原上只有草，没有树，木材当然是最缺乏的物质，因此，对森林富足区域的人来说，草原上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木材贫困户”。

麦宿地区的人属于半农半牧区，他们也放牧，家家都有牛羊，但在森林里放牧。他们夏天会到山上去，住在简易的放牛棚里，放牛棚由木头搭成。他们的房子也是典型的土石木结构，按照当地的习惯，盖房子是一定要用木头的。麦宿民居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当地人能够用当地的碎石和泥土，筑出坚固的墙，能用当地的大树，搭建出精美的宫殿般的住宅——这住宅的一层，是给牛羊住的，人，多半住在二楼；楼顶，则是敬神煨桑的地方。

“藏区牧民定居工程”，是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部署，从2009年起，准备用4年时间，投资180多亿

元，在29个牧区县规划建设1409个定居点，并辅以配套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善藏区牧区48万未定居和仅有简易固定住所的牧民的生活条件，结束全省藏区牧民的游牧无定居生活，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牧民居住、生活条件和牧区基础设施有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有较大提升。

2008年12月，四川省牧区各县又对500户牧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7.83%的牧民愿意定居，98.14%的牧民户愿意出资建房。

要盖房子，就需要建材，而建材，就需要树木。牧民定居工程解决建材用树的办法，是在各有林县确定采伐点，像德格县这样的地方，有一些乡属于有林乡，一些乡则属于无林乡，那么有林乡的人，有义务给无林乡的人提供木材；而在整个甘孜州，有些县完全属于无林县，那么他们的木材，就需要有林县来帮助供应。

冯永锋，《光明日报》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

图片来自天下溪草原游学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67-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1>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367-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1>

当草原要吃掉森林（二）

冯永锋 2011年6月22日

在这篇报道川西木材之争的最后，冯永锋采访了一位当地官员，了解他如何在政治和环境承诺之间做出平衡。

德格林业局局长张克林饱受砍树的烦恼。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到一些需要发展森林的地方去种树。每年他们都要种下几十万棵。

而同样作为林业局局长，他又成为“木材供应商”，为牧民定居点提供优质、足额的木材，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比如生态保护，更加压迫着他的工作目标。

按照德格县的规划，三年的时间，德格要修建7000多套牧民定居房，几百套村庄公用房。

按照整个规划算下来，德格至少要提供16万立方以上的木材。

同时，还要给兄弟般的无林县，比如石渠县，提供一定的木材支持。

同时还要给2010年发生大地震的青海玉树州，提供灾后重建所需要的部分木材。

为此，德格县确定了6个木材供应点。需要的木材，指定到这些供应点去采伐。

张克林说，木材采伐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出台了大量的管理措施。大体方案是需要建房的乡村，先统计木材需要量，同时落实到户，大体一户人家，20方木材左右。他们按照需求，到林业局来批指标。然后再拿着这些指标，到指定木材采伐点去砍伐。

牧民不会砍树，砍树需要资质，因此，他们可以雇佣那些有资质的木材公司、木材运输车辆去帮助砍伐和运输。因此，从执行过程来看，指标等于要交到那些帮助砍伐的木材公司手中。木材公司把木材砍好后，运到需要木材的定居点，供应到户，并且切实搭建到住房上。为了让牧民全心全意地参与定居，政府给了牧民大量的补贴。大概一户补贴6万元左右。这样，他们整个房子建下来，几乎不需要花自己的钱。

在这过程中，乱砍滥伐和偷拉盗运现象，可能在所难免。张说：“我们林业局人手非常少，但也一直在加强监管。”

不过，张克林承认，大量的木材指标，确实给当地



的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德格县的森林覆盖率才32%左右，又属于高海拔地区，一年的木材新增蓄积量，不过一两万立方，而要在三年之内，贡献16万立方米，确实有些超负荷。另一方面，砍伐过程中如果过度粗暴，把水源地、陡坡地、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木材也“顺便”砍掉，那么，当地的生态环境必然遭受极大影响，未来木材砍伐区的泥石流会频发，生物多样性会严重受挫；当地人心理会遭遇严重的打击。

在这过程中，乱砍滥伐和偷拉盗运现象，可能在所难免。张克林说：“我们林业局人手非常少，但也一直在加强监管。”

张克林说：“现在，麦宿地区的采伐点被当地人控制之后，他们不让砍伐，势必把采伐的压力就转移到其他采伐点。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尽量让牧民定居房少用木材，多用水泥钢筋石棉瓦、铁皮屋顶等代替，如果替代成功，那么，整个德格的木材使用量，可能能够控制在6万立方米以内。”

麦宿地区阻止砍伐队的事情，在笔者赴当地调查时，已经发生10个月了，可德格县迟迟没有派出工作组去参与解决。

在张克林看来，麦宿地区的人自发阻止木材砍伐，是在多管闲事。因为按照行政上的划分，麦宿地区的采伐点，其实不属于普马乡、达玛乡和岳巴乡，不少地方甚至从行政上属于白玉县，或者属于白玉与德格争议地区。

张克林说：“这些人设立木材检查站是非法的，他们没有权力去做不属于他们行政区域内的事情。”

但对于麦宿地区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很少的疆界观念，而且从传统上说，这些地区都属于麦

宿地区。从更传统的观念上说，即使不属于麦宿地区，他们看到了，他们也有责任出来阻止。因为，森林，是不是能乱砍的。

一些当时被雇佣去砍树的人，虽然没拿到工钱，但也已经开始到寺庙里忏悔，发誓再也不砍树。

那些砍落在河边、路上，已经锯好但尚未运走的木材，一直就流落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把它们据为己有。偶尔有人会骑摩托车来捎带些回家去，但运走的也只是边角料。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木材即使已经倒下，也仍属于森林，不随便属于人类。

2010年10月份，一个叫王五之的旅游者在经过麦宿地区时，发现这里木材砍伐如此惨烈，无法控制难过的情绪，她拍下了许多现场照片，并把它们发到了网上。

著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有一个森林项目组，他们敏捷地从网上接应到了王五之发送的信息，并决定组织队伍赴四川德格现场调查。（详见中外对话“川西天然林遭砍伐”一文）。

2011年3月中旬，调查队伍如期抵达四川德格，王五之也作为志愿者参与了调查。

绿色和平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大片的珍贵天然林遭到破坏性采伐。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主任易兰说：“被采伐的大部分都是直径达40-80厘米的云杉和冷杉，直径达到100厘米、高达20米以上的树也不在少数。在这样高海拔寒温带地区，这样的树的生长需要上百年。即使进行补植抚育，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植被。”

在绿色和平走访的甘孜州白玉县登龙乡登曲沟长约七八公里的山谷里，随处可见被砍伐的杉木躺卧在河两岸的山上，形成一个个“滑木沟”。这些山体山势坡度大，而且土体疏松，在这样的陡坡进行采伐极易引起山体滑坡。这些本应起到涵养水源作用的珍贵天然林，现在却横七竖八倒在山上和河水里。

易兰说，2011年是联合国大会规定的“国际森林年”，也是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的起始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的决定，我国将继续停止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四川全省都在国家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区’范围内，任何天然林的采伐都应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的这种破坏性采伐，显然与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的精神相悖。”

四川西部地区的森林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天然林之一，这里的森林更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有熊、豹、白唇鹿、白马鸡等珍稀和濒危动物。而森林的砍伐使它们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在当地人的保护下白马鸡近年来刚刚得到恢复，如今却不得不在被砍伐得支离破碎的森林中生存。

2006年的3月，绿色和平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地图专家经过3年努力的成果，发布了全世界当时为止最为精确的原始森林卫星地图。它利用卫星地图数据，将地球上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的面积和分布准确地勾勒出来。根据这一地图，目前中国的未受侵扰森林仅占国内森林资源总量的2%，主要分布在包括白玉在内的四川西部，云南怒江州中缅边境地带，以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以及东北和新疆的极少地区。

易兰说：“我们在近一年的几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个别省份或地区，天然林资源遭不同程度破坏。”

冯永锋，《光明日报》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

图片来自网络microfotos.com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68-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2->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368-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2->

克什米尔的城市丛林

亚瑟·帕维兹 2011年5月20日

毫无节制的城市发展正在摧毁克什米尔宝贵的湿地，政府对此漠不关心，难辞其咎。亚瑟·帕维兹从印度北部发来报道。

克什米尔地区的首府斯利那加城，坐落在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在过去若干年中见证了城市化进程的巨变。如今这里有一百四十万居民，城市面积大幅度地扩大，这让土地管理变得十分复杂。由于城市化发展没有任何规范，当地居民以及生态环境，在已经承受环境灾害、泥沙淤积以及占用资源等巨大压力的同时，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环境专家认为，如果仍然毫不控制过快的城市化，克什米尔宝贵的湿地将在数年间消失。这将威胁到克什米尔湿地上生活的数百万的动物与候鸟的生存。专家警告说，在过去数年中，这里的候鸟数量已逐步下降。在克什米尔的湿地上工作的环境学家沙希德·艾哈迈德说：“占用湿地以及湿地淤积等问题都是导致候鸟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艾哈迈德进一步解释说：“例如，霍克萨尔湿地，位于斯利那加城以北16公里处，其面积已经从原先的13.75平方公里缩小到4.5平方公里。再往北的海盖姆湿地，其面积已经缩小了近一半。”据上世纪90年代末邦政府环境与遥感部门的记录，斯利那加城中及周边的500个湿地都已经完全消失。

米安·贾维德是位于斯利那加的环境与遥感部门的部长。他表示，目前对保护湿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如森林和野生动物）做出的相关努力实在太少，为此他十分担忧：“纵观喜马拉雅山区的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尤其是克什米尔，这儿快速却无序、无节制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对我们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森林、湖泊、江河、溪流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生态系统。”

贾维德曾任斯利那加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主任，他称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十分危急。他认为：“受影响栖息地的自然生态重建与复原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我们环境恶化的速度。要恢复我们宝贵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

环境专家说道，过去的斯利那加城拥有天然的平衡稳定的环境，这儿拥有森林、湿地，拥有丰饶的耕地，拥有高山与组合地貌，曾是各种生物的家园。

“湿地在调解水文尤其是控制洪水中发挥着重要的所用。”克什米尔大学的环境科学教师沙希德·艾哈迈德说道，“许多野生物种都依赖于这些水体生存。这些湿地却要么被飞速扩张的芦苇侵占，要么被肆意膨胀的人口威胁，人们毫无节制地排放污



水，或者因为缺少耕地而侵占湿地。”

由于污水、水土流失、耕地不足与乱砍滥伐，达尔湖与纳金湖的面积已经从36平方公里挤缩到12.5平方公里左右。湖边不断增多的水上花园与别墅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都加速了双湖的富营养化，威胁到水体和水生物的生存

据上世纪90年代末的记录，在斯利那加城中及周边的500个湿地都已经完全消失。

由于缺少恰当的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斯利那加城的污水都直接或间接地排入各种水体中。而斯利那加低洼地区未经许可建设的住宅区中，人口迅速增长，这使得废物处理问题成为空前的挑战。这对水质造成了严重影响。

环保人士说道，克什米尔水域中的几种特有的鱼类也因为污染严重而濒临灭绝。据淡水鱼类专家教授阿尔·尤素甫说，在克什米尔水域，除草剂、杀虫剂与不合格肥料的过度使用成为危及这些鱼类的主要原因。这些化学制剂在农业和园艺中的应用显著增加，让尤素甫等专家十分担心。

然而，城市的快速扩张背后还有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后果，这就是由建设热潮所驱动的越来越猖獗的木材走私。由于没有一个连贯的林业政策，也没有足够的监管，克什米尔的森林也经惨遭大规模的砍伐。为了给发展工程让地，人们继续啃噬宝贵的森林资源。

经国家林业部门人士透露，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发展项目而占用林地是无法避免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都喜欢在林地上开发项目，而不会考虑私有土地，否则就会出现赔偿问题。”

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从森林抽血，还消耗了上千公顷的农业用地。克什米尔农业部的执法副主任

纳齐尔·艾哈默德·卡兹说，在过去数年中，克什米尔已经有超过一万公顷的农用地被住宅和商业用地所占用。

克什米尔中部的森林管理员尼萨尔·艾哈迈德说道：“几十年来时兴于斯利那加的横向扩张概念，事实上具有极大的灾难性，不像纵向扩张，横向扩张消耗了额外的空间和建筑材料，包括木材。”

克什米尔的环境专家们将这个喜马拉雅城邦今天面临的环境困境归咎于相关的政府部门。“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敦促邦政府出台一项土地使用政策，但是至今还没见到任何动静。这就是我们如今麻烦重重的原因。”克什米尔大学教授、在克什米尔广泛地参与环境工作的沙克尔·艾哈迈德·罗姆叙说道。

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的政府无法提交其环境状况报告（SOER）——这是一项强制性执行的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而印度其他各邦与地区都在2002年开始的第10个五年计划内，向环境与森林管理部提供并通过它们的环境状况报告。

“克什米尔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还没有提交相关数据。我们已经数次提醒并强调提交该报告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复。”这句话引述自SOER项目的协理员穆塔希拉·阿比达·瓦希德·德瓦发表在当地一份报纸上的意见。

有趣的是，这些让人无奈的部门——包括旅游、住房、城市发展相关部门以及湖泊与水路发展局——都驻守在保护环境与生态的关键位置。但正如德瓦所观察到的，如果不能提交一份综合的环境状况报告，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将无法得到“绿色印度”的基金赞助。该项目由中央政府赞助并策划，向各邦政府拨款，用于最大程度地降低由无序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专家称如果没有这些基金，要重建克什米尔的水文与森林资源，将其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或者阻止进一步的破坏，都将难上加难。

亚瑟·帕维兹是驻克什米尔地区的环境记者。

图片来自batschmidt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05-Kashmir-s-urban-jungle>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305-Kashmir-s-urban-jun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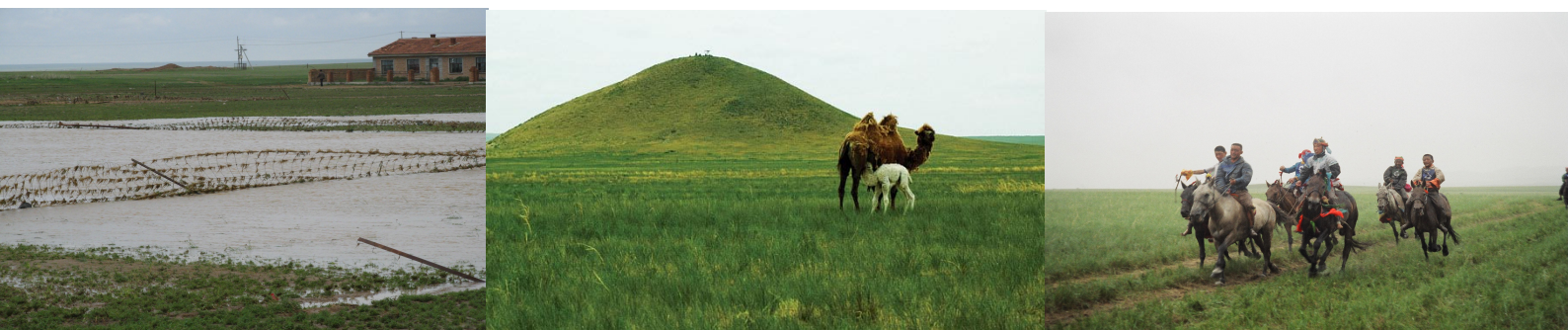
治理之路

【编者按】

贝丝·沃尔克的《中国的生态高原政策》和叶蓓的《重建草原？》，回顾了中国政府以“退牧还草”为代表的草原生态政策。尤其在叶蓓的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项工程的背景、措施，并评价了其效果。

与政府治理对应的是牧民们自上而下的保护行动。周维在《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合作化之路》中，讲述了一个内蒙古嘎查（村）自发进行草原管理，探索发展之路的历程。冯永锋的《社区共管：措池村的生态文化之道》则讲述了一个三江源藏族牧区从本土文化出发，自发开展自然资源监测与管理的故事。

中国的生态高原政策	24
贝丝·沃尔克 2010年1月25日	
重建草原?	25
叶蓓 2010年1月26日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合作化之路	27
周维 2011年4月8日	
社区共管：措池村的生态文化之道	29
冯永锋 2007年9月11日	



图片来自：天下溪“人与草原”项目、舒泥

中国的生态高原政策

贝丝·沃尔克

2010年1月25日

气候变化给青藏高原上的草原物种带来新的威胁。本周，多位作者将报道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及其环境和社会影响，**贝丝·沃尔克**率先对这一问题做出介绍。

青藏高原的草地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草原生态系统之一。自从2000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作为“第三极”的全球重要性更是得到广泛认知。青藏高原既是全世界40%人口命脉所系的“水塔”，又是拥有独特自然和文化财富的地理区域。

五千年来，传统的牧业和狩猎一直维系着这个脆弱的高海拔生态系统的生存。但是，如今气候变化使这里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比如，在高原腹地黄河源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草原已经退化成半荒漠状态。

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已经采取许多政策来遏制荒漠化趋势，保护草原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政策包括划分牧场所有权，围栏放牧等等。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国性的环境恢复措施，在农业方面是“退耕还林”，在牧业方面就是“退牧还草”。要想让退化的草原恢复到其自然状态，必须进行十年以上的禁牧，这就是上述政策的基础前提，因此牲畜必须迁移。现在，一轮空前的禁牧行动正在青藏高原的草原上展开。

但是，这一政策近来已经被另一个新的保护计划所超越，这就是“生态移民”。其做法就是让面临重大环境压力的地区人民移走，以便开展保护工作，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如此。2002年，生态移民正式成为一项国策。主要实施对象就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三江源地区（即黄河、长江和湄公河这三条亚洲大河的源头）。2003年，该地区成为世界第二大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现在，成千上万居民被迁离脆弱的草原地带，到新居所从事农业，或者到新的城镇居住。比如，青海已经新建起35个新的定居点，还有51个正在建设。根据政府的规划，截至今年初，已有超过10万名三江源居民得到重新安置（占当地人口的17%），以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



但是，这些安置项目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主要是关于移民政策及其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项目不仅仅牵涉到环境保护，也涉及游牧民族的 城市化问题（在这个个案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是藏族和蒙古族）。此外，近来的研究表明过度放牧实际上并不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

叶蓓的文章《如此草原恢复》，明天将在中外对话网站发表。在文中，她对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草原治理政策和移民安置计划进行了讨论。她说最新研究表明此类措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可能被过度渲染。接下来，朱迪丝·沙皮洛将对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科塔印第安部落的悲惨历史进行仔细回顾，并分析哪些教训是中国可以从中吸取的。

贝丝·沃尔克，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研究人员。

首页图片来自 草原之友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469>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469>

重建草原？

叶蓓 2010年1月26日

中国实行了许多保护草原环境的政策，然而研究表明，这些措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被过分高估。叶蓓撰文。

2003年，中国实施了一项名为“退牧还草”的新工程，号召取消放牧，以便遏制和扭转严重的草原退化现象。该工程建立了各种围栏区，其中一些牧场每年关闭几个月（循环放牧的一种方式），一些牧场休牧五到十年，还有一些则永久禁牧。

退牧还草工程的季节性循环放牧和播种观念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草原政策类似。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出于对大规模草原退化的关注，包含许多技术方案，如消灭鼠兔（兔的一种），补贴恒冬家庭，建立围栏，提供牲畜住所，种植补充性冬季草料。除了加强技术干预措施以外，这些政策还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种赋予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的制度）从农业区推广到牧业区。推广冬季牧场使用权私有制的构想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一措施将给予牧民适当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管理土地并成为更有效的市场生产者，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让牲畜较少的贫穷家庭将牧场租给牲畜较多的家庭，使之成为一种产生收入的策略，这在一些地区也被认为是有益处的。

和许多政策一样，退牧还草的实施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在西藏自治区，种植牧草等与原有政策一致的干预措施得到重点推广。牧民倾向于把该项目提供的围栏材料用于储备生产力较高的高山沼泽草地，将后者作为冬季饲料或应急饲料。然而，负责决定围栏区域的政府官员则遵从上级政策，将生产力低下的高山草地和沙地用栅栏封闭不等的时间，以便改善这些土地的情况。这一分歧源于各方对当地草原生态的理解不同，导致当地牧民对这一项目缺乏热情，而政府对于牧区损失的赔偿也不足，特别是对于原本许诺给当地牧民的牧区。种草的努力目前为止似乎并不十分成功，尤其是在西藏自治区西部的干旱地区。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些地方，退牧还草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式，沿着高速公路建造混凝土柱围栏，其中一些甚至没有形成完整包围圈。然而，当地居民必须保卫这道重要的围栏不被小偷侵入，唯恐官员视察时它已经消失。

退牧还草工程的一些方面对原有政策进行了扩展，重点集中在改善牧民对牧场的管理的技术手段上；退牧还草工程的一些方面对原有政策进行了扩展，重点集中在改善牧民对牧场的管理的技术手段上；然而该工程的其他部分则与原有政策大不相同——试图将牧民从土地上彻底迁移出去。这一截然不同的形式已在青海三江源（“三条河流的源头”之



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区开始实施，这一区域被称为中国的“水塔”，对于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在这里，退牧还草与生态移民共同施行，促使牧民在城镇中定居十年或者永久定居。根据省政府的计划，自愿集体迁居或永久放弃畜牧的牧民将得到8万元人民币（合11718美元）作为补偿，并且可在五年内得到8000元（合1172美元）的粮食补贴；自愿单独迁居或休牧十年以上的牧民可得到40000元（合5859美元）的补偿和6000元（合879美元）的粮食补贴；最后，由于环境条件恶化而提前搬迁的牧民将得到20000元（合2930美元）的赔偿计划和每年3000元（合439美元）的粮食补贴。

大规模围栏育草和使用权私有化会降低草原的机动性。这会使得草场更易受到暴风雪的打击，而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今后暴风雪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猛烈。

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有几个不同的目标：大幅度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状况和提高牧民的生活标准。此外，国务院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明确地将退牧还草列为气候适应策略的一种。然而，这些目标能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现有的证据表明，社会成本很高，然而生态效益存疑。

使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能在任何地区改善草原退化问题，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草原必须退化；过度放牧必须是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停止放牧必须能中止生态系统的不良状态。然而，许多科学家（例如理查德·哈里斯的《青藏高原的牧场退化》，点击这里阅读）质疑关于整个高原普遍退化的概括陈述。的确，一些数据似乎是来自毫无根据、方法可疑的调查，而许多经常被引用的关于退化程度和改善速度的统计数据就以这些数据为基础。

为更严格的确定牧场退化的程度，中国政府最近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却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因此，尽管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过度放牧无疑是导致某些地区植被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以及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极少有研究严密地探讨这些相互影响的多种因素，或涉及在诸多干预条件下生态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其他状态的问题。为了阐明禁牧对某些地区的生态影响，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另外，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种形式的“退牧还草”都不会是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不能既保护了牧地又适应了气候变化。大规模围栏育草和使用权私有化会降低草原的机动性（尽管小范围的草原圈养对于保护牧场和饲料加工通常是有益的）。这会使得草场更易受到暴风雪的打击，而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今后暴风雪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猛烈。此外，这种大范围圈养还会导致牧草资源分布不均衡，给迁徙野生动物群和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科学家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牧地按户分配以后，当地面临水资源短缺的牧民是原来的3倍（言召丽等，《青藏高原牧地私有化政策以及实施状况回顾》，[点击这里阅读](#)）。另外，最近在青藏高原东部进行的全球变暖和放牧实验表明，适度放牧能控制全球变暖对于减少生物多样性和降低牧场质量的不利影响。实验表明，全球变暖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包括药用植物，同时，全球变暖还会降低单位面积内生物数量，包括可口的野味。然而，当放牧存在时，这些影响会减弱（详见茱莉亚·克莱因的文章，[点击这里阅读](#)）。这些结果表明，退牧还草可能无法帮助适应气候变化。

目前关于生态移居牧民的研究也表明，移居对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被高估了。一些自愿移居的人表示后悔了，他们说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新城镇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必须用钱来购买。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政府补助是远远不够用的，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提高了生活成本而政府补助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项在果洛进行的研究表明，移居到城镇的牧民年收入低于过去的水平，开销却变大了。受访民众也表示，移居乡镇后，由于生活条件和饮食状况的改变，他们的身体情况也大不如前。

另外，西藏的牧民不会说汉语，也没有掌握能在城镇赚取收入的技能，这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他们中的一些人去工地做了建筑工人，一些人找到了新的赚钱机会（例如培育和贩卖藏獒等），但是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暂时的政府补助或挖掘冬虫夏草来赚取

微薄收入。那些没有能力挖掘冬虫夏草的人是最惨的。即便参加技能培训中心的培训，也经常找不到工作。一旦政府补助消耗殆尽，失业或就业不足造成的问题就会进一步加重。的确，一些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据说有些无所事事又没有收入的牧民干起了偷窃的行当，以至于他们的定居地很快便有“小偷村”的绰号。

与此同时，在三江源地区的许多地方，移民的主要是家畜很少或根本没有家畜的家庭。他们的一些牧地交由其他家庭放牧，这破坏了该项目最初的生态学构想。基于上述因素，在很多地区，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似乎无法完成既定的环境和社会目标。相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保护牧地或提高气候适应性，反而对当地居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严密的实证性研究，以便检验牧场退化的原因和程度，衡量现有政策的社会经济学和生态学影响，并找出能提高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最好措施。

叶蓓，科罗拉多州大学地理学助理教授。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方向包括财产权、自然资源争端、环境历史学、新兴环境保护论以及西藏发展及土地使用演变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

图片提供：周立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470>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470>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合作化之路

周维 2011年4月8日

基于传统的合作精神是内蒙古牧区合作组织的灵魂，也是牧民保护草原、发展经济的出路。中外对话周维报道。

这个冬天，持续不断的大雪覆盖了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旗为县级行政单位）牧区。在我打给浩比斯哈拉图的电话里，隐约听到风声和机车开动的声音。“这几天特别忙。东乌旗（东乌珠穆沁旗的简称）雪灾，牲口没有草吃了。我们哈日高毕合作社正在组织社员给牧民们拉草救灾呢。”电话里浩比斯哈拉图的声音没有焦虑，像往常一样，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40岁的浩比斯哈拉图是哈日高毕牧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哈日高毕嘎查（村）的嘎查长，英俊魁梧，却是一个在任近20年的老嘎查长了。多年来，他带领合作社和嘎查辅助牧民发展，凭借威信治理嘎查，帮助穷人，保护草场，在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中赫赫有名。

第一次去拜访他们嘎查是在2007年，我们的车停在路边，远远地见三个骑马的汉子卷着风尘朝我们奔来，蓝色的蒙古袍在风中摆动，这几乎是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景象。在走进蒙古包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要请老人们先行，然后依照年龄和性别坐在相应的地方，大家接受敬酒，喝茶都小心谨慎，唯恐犯错过丑。这个嘎查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尊重传统。在远离传统文化的很多牧区，这些礼节早已被人遗忘。我还注意到，在草原的其他地方，都是我们举着相机、摄像机拍牧民，在这里却是牧民们拍我们。面对北京来的学者和官员，这里的牧民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坦然。这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东乌珠穆沁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最北部，相对于内蒙古其他牧区，这里水草丰美，草原文化保持良好。但面对狂风暴雪，像中国广大牧区一样，东乌旗的生态和经济表现得十分脆弱。灾害（旱灾、雪灾等）总是突如其来，常常造成超过半数的牧民破产。此次雪灾过后，东乌旗政府紧急调拨了草料和运输设备救灾，但牧区地广人稀，大雪过后道路难行，将草料送往牧户的工作变得非常艰巨。东乌旗政府只能将发放任务层层委派。与其他嘎查不同，浩比斯哈拉图组织嘎查和合作社成员一同承担发放任务，利用牧民的互助和自我管理，草料发放快捷高效。

2001年的一场旱灾曾使哈日高毕嘎查损失了一半牲畜。许多牧民被迫借高利贷挽留损失，旱灾结束后却还不起钱，只得把自家的草场租给贷主。为了尽快捞回本钱，外来者往往不计后果地超载过牧，造



成草场迅速退化。实际上，这种因高利贷使草原退化的例子，在内蒙古草原上“遍地开花”。在失去了合作传统的社区里，面对灾害的牧民们，只能选择借高利贷。

但草原承包之后，牧民们在“自己的”草原投入了太多人力物力，自家草原的兴衰关系到家庭的兴衰。

在过去的20年里，土地承包政策在内蒙古草原普遍推行以后，为保护自家的草原，大部分牧民建立了围栏。牧民们说，围栏不仅分割了草原，也打破了他们的游牧传统与合作文化。以前，草原是大家的，为了躲避灾害，内蒙古西部的牧民可以赶着牲畜到数千公里外的地方寻找丰美的水草，同样，东部的牧民也可能到西部去避灾（在游牧生活里，这种跨区域的远距离游牧方式叫做“走敖特”，是避灾的主要方式）。在任何地方都有人欢迎远道而来的陌生客人。在温带季风气候影响下，内蒙古草原每年的降水量和降水分布无规律可循，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旱灾或雪灾。多变的气候造就了牧民们互助与包容的胸怀。帮助远来的客人不仅是礼节，更是生存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有到陌生草原避灾的可能。但草原承包之后，牧民们在“自己的”草原投入了太多人力物力，自家草原的兴衰关系到家庭的兴衰。现在旱灾的时候，“走敖特”的牧民要给牲畜饮水时一定会见到蹲在机井盖上收取草场费的主人。收费按牲畜数量计算。

如果不选择“走敖特”，灾民就只能依靠高利贷购买高价的草料。灾害过后，破产、丧失草场的牧民不计其数。而贷主过度利用、破坏草场，成为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浩比斯哈拉图意识到要想保护草场，必须让牧民合作起来。他代表嘎查出面帮助贫困户还清了贷款，

收回了草场，对富裕的和贫困的牧民做了资源整合：他让没有牲畜的贫困牧民用计费劳动和嘎查内部出租草场的方式，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让富裕牧民以合理的价格租赁嘎查内贫困牧民的草场。他还在嘎查制定制度，资助贫困家庭上学的孩子，帮助嘎查年轻人外出学习。这个时候，浩比斯哈拉图想到了牧民合作经营，他们成立了协会，从传统游牧的记忆里挖掘适合现代牧区的生产经验，让牧户联合管理草场，合理分配劳动力。在传统的蒙古游牧部落里，老人是部落的智囊团。在哈日高毕嘎查，牧民委员会是嘎查的决策机构，由嘎查中有威望的老人组成。所有的政策都是由牧民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而作为嘎查长，浩比斯哈拉图公正和无私，受到牧民们的拥戴。

2007年7月，一个由牧民协会举办的牧区发展交流论坛在东乌旗附近的牧区举行，主题是合作组织经验交流。正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合作社”的概念走进了牧区。一些有互助合作传统的牧民已经在自发探寻现代合作的道路。交流会之后，浩比斯哈拉图注册了合作社。东乌旗乌珠穆沁羊曾经是跟随成吉思汗远征军的畜群之一。它们体型大，抗灾抗病能力强，曾是牧民们引以为傲的优良畜种，但近年来在国家反复推行的畜种改良浪潮中面临严重退化。合作社成立后，牧民们建立了羊种选育网络，从附近牧区收购优良的种羊，内部交换、选育。现在合作社牧民家家经营种羊繁育，一头种羊的价格比普通羊高了一倍多。“牲畜的经济价值提高了，数量就可以降低了，草原的压力也就小了。”浩比斯哈拉图说。

2009年，浩比斯哈拉图带领牧民去呼伦贝尔盟访问学习其他牧民合作社经验，开始谋划畜产品打入市场。牧民从合作中受益了，但力量仍很单薄。浩比斯哈拉图开始注意了解别人注册品牌方面的经验。浩比斯哈拉图与一些牧民联合发出倡议，呼吁牧民们建立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共同开拓市场，建立牧民自己的专业营销服务团队，来应对中间商对牧民的盘剥和畜产品企业的垄断。

据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经营管理站统计，2006年至2008年，内蒙古牧区合作组织由260多个发展到390多个，带动牧户由15516户增至37687户。这其中有很多是像哈日高毕嘎查那样由牧民自发建立的合作组织（合作社或协会），当然也不乏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的投机者。多年研究牧区合作组织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敖仁其研究员对中外对话说：“我们关注由牧民群众自下而上建立的合作组织。基于传统的合作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牧区合作组织的灵魂，也是牧民保护草原、发展经济的出路。”

周维，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图片为牧民与学者在研讨合作社事宜，由天下溪“人与草原”项目提供。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220-Joining-forces-on-the-grasslands>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220-Joining-forces-on-the-grasslands>

社区共管：措池村的生态文化之道

冯永锋 2007年9月11日

当地群众帮助自然资源保护者保护中国西北部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冯永锋来自青藏高原措池村的报道。

7月18日，青海措池村，牧民们举办的“生态文化节”正式开幕。这一天的下午，在北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大军，在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张可佳组织的“绿色记者沙龙”上，向大家讲述措池的魅力，讲述他的担忧和喜悦。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源野生动物保护核心区，总面积约2124.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最高达4800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纯牧业村之一。

第一次来措池村的人可能觉得这里还是世外桃源，风景如画，民风纯朴。但是经常来措池村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世外桃源跟以前比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公路修通了，从格尔木到措池村以前要走三四天的山路现在半天就到了；村民从骑马改成骑摩托车来放牧，当然这还需要买汽油和摩托车配件；有些村民还买了数码相机等现代电器，都可以到刚修好的太阳能电池站去充电。

便捷的交通，和随之而来的频密的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给村民带来舒适现代生活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邪恶的侵蚀。人与人之间友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一向是措池村或者说中国许多地方的荣耀。但是，有很多人发现，这几年，人与人之间的邻里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邻里关系，都有恶化的微妙趋势。措池村的草原退化就是这恶化趋势的表现之一。

不过，措池村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这恶化的趋势。

哈希·扎西多杰，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扎多”，是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副秘书长，2007初获得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公益奖”。他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实践着一种能够实现自然保护与社区强健之间双赢的方法，这种方法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社区共管”。措池村，正是这一理念实施的重要领地。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村民们被发动起来，在“监测”他们牛羊的同时，监测物候、野生动植物、草原和山水的变化。扎多认为，其实保护的问题本质上是个社区强健的问题，是如何化自私为半公益的问题。有人认为，一个社区要强健，一定要等到它富裕之后。中国有太多的地方，都抱着“先污染、



后治理”，“先砍树，后种树”的想法来对待环境保护，可实际上，你不一定要等人快死的时候再来给他治病，你完全可以在他还健康时，就帮助他采取必要的保健措施。“有人老说要有钱才能做保护，我有两句话来反驳，一是穷妈妈未必不懂得艺术，未必比富妈妈更不会打扮她的子女；二是有钱未必有智慧，未必会做公益，甚至有可能越有钱越邪恶。”

著名自然保护组织“保护国际”中国区代表吕植，和王大军同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她带领的团队给了措池村强大的科研力量支持和精神支持。他们帮助村民设计监测的种类和方式，帮助分析监测的结果，与村民一起共同做科研。王大军说：“牧民有非常多的感官知识，他们长年累月积累的社区自然知识要比我们丰富，科研的过程是调动和改良他们这种知识的过程。现在的青海，到处都是杀高原鼠兔，只有措池村的人不杀，因为他们发现，草原退化也许不是鼠兔的原因，是草原先恶化了，才有鼠兔的大量出现。旱獭也是如此，现在旱獭很值钱，有外边的人来滥捕滥杀，可它与鼠兔一样，是高原生态系统中的‘中间件’，如果它们少了，狼、棕熊、猛禽，怎么存活？杀了它们，草原真的就能恢复吗？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推广围栏草场，牧民非常喜欢，但是我们也在提醒他们：这种把连绵的草原划分为独立片区的方式，真的是可长久的吗？”

科研是带有公益性的，这种微妙的公益乐趣也许会成为社区的新型融洽剂。扎多和吕植这些人希望找到一种“扶助手段”，让村民享受做科研和公益的乐趣，进而真正认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清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从而改善随着商品经济入侵而日益滑坡的社区邻里关系。吕植说：“人们害怕的并不是交通，也不是商品，而是这些商品和交通所附带的对人性和自然的侵犯力。而基于‘社区共管’基础上的科研、公益活动的掺入，可能是对抗和缓冲社区恶化的一个理想办法。”

基于这个考虑，为了防止邻里关系滑坡，强化自身的文化魅力，进而增强社区的共同归属感，措池村开始举办“生态文化节”。在将近10天的时间里，所有到达这个村庄、生活于这个村庄的人，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节目”。这节目既有传统的转山、歌咏、传说讲述，又有新添的认识动植物、摄影比赛等。

扎多说，乡村生态文化节搭载在藏族传统的“过桑”这个平台，在继承了传统的本地生态文化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强烈的“绿色”概念，包括服饰表演、赛马、放生、杀戒（野生动物）、话说山川、本土民族体育、讲解宗教生态文化、社区监测评比、评选“最具慈悲之心”村民、播放生态影视宣传片等多种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实践证明，这些举措有助于培养广大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凝聚乡村向心力，培养牧民自觉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热情，倡导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鼓励传承优秀的生态文化思想。

本土的文化是诱人的。“保护国际”把“文化节”当成了员工教育和实地科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程序，鼓励员工实地学习生态学知识——尤其是高原生态系统等方面知识，通过向牧民们学习，提高参与活动的员工对社区保护工作的理解。“保护国际”保护项目主管孙姗说，他们在一种既欣赏、赞美、喜悦，但又无比忧虑的复杂态度中参与了这个文化节。“有时候你说不清，到底是我们在帮助他们还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也许是大家都是共同救护自己吧。”

冯永峰，《光明日报》记者。

图片提供：山水自然保育中心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309>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309>

世界草原的故事

【编者按】

从中国的草原到世界的草原，现代化、开发与草原、畜牧业的冲突在不同的地方一遍一遍上演，有的人们在探索应对之路，有的人们在反思过去的教训。赛德·海瑟的《畜牧业的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讲述了非洲流动放牧应对现代化进程的故事。当地人认识到，游牧养殖方式在繁荣了非洲经济的同时还保护了牲畜免受干旱的威胁，但草场被一点点瓜分，成为影响流动放牧乃至畜牧业经济的严重问题。他们面临与中国草原相近的问题，却在探寻不一样的解决之路。

朱迪思·夏皮罗的《直面美国触目惊心的教训》给中国带来的则是西部大开发的警醒。美国西部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大自然的征服，不时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运动所效仿的榜样。然而，作者回顾了美国的原住民在他们的土地上被白人定居者连根拔起的血泪史，这使当地的环境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朱迪思·夏皮罗特别提醒中国在开发其土地的过程中要对美国曾经的错误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

罗尼·魏努力的两篇《共同管理：源自蒙古国的可持续草原之路》讲述了蒙古国草原在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中面临退化，“共同管理”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作为宝贵经验，被推行到各地牧区。

畜牧业的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	32-35
赛德·海瑟 2010年3月10日	
直面美国触目惊心的教训	36-41
朱迪思·夏皮罗 2010年1月28日	
共同管理：蒙古国的可持续草原之路	42-44
罗尼·魏努力 2011年12月6日	



图片分别来自：club.sohu, cr20g, com, 《西雅图酋长的宣言》

畜牧业的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1)

赛德·海瑟 2010年3月10日

游牧养殖方式在繁荣了非洲经济的同时还保护了牲畜免受干旱的威胁。即然如此，为什么它现在面临着威胁？赛德·海瑟撰文对此进行解读。

流动放牧，或称游牧的畜牧方式在非洲干旱地区的经济繁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估计，在非洲东部和西部，大约有5千万畜牧养殖者完全依靠天然旱地草场来放养牲口，而这些牲口是他们的家庭和村子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这些牲口还支撑着庞大的肉食产业以及原皮和生皮工业。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当其它土地利用体系无法发挥作用时，流动放牧能够为国家和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如今，牧民不仅能够将最新的牲畜市场价格信息下载到他们的手机上，还可以骑上价格低廉的中国产摩托去追赶跑远的牧群或迷路的骆驼，或者通过步行、陆路、或海路的方式将他们的牲口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内贸交易或国际交易。人们普遍认为牧民是小众群体。他们与世界脱节，生活方式也因循守旧。然而现实中，牧民早已完全融入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中。

但是现在，流动放牧正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出于各种各样其它的用途，草场被一点点的瓜分。而草场的水源供给以及与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随着流动放牧的活动范围日益狭窄，畜牧养殖的经济收益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牲口的出肉率降低，产奶量减少。此外，它们对于干旱和疾病的抵御能力也有所下降。而这正把人们引向一条充满贫困、资源退化，以及冲突的道路。

针对游牧流动性的问题，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和创新实践正在许多非洲干旱地区扎下根来。非洲联盟和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正逐渐认识到增强牲畜的移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这也促使一些政府开始制订各种信息充分、循序渐进的政策，从而反映出出现代游牧民的需要。

为何采取游牧的方式？

其实，游牧民迁徙是为了带着他们的牲畜辗转于牧草最丰美的地方。不同时期分散于不同地方的草场才是游牧养殖在如此困难的环境里保持高产的原因。而对于那些依靠单一牧场和规模经济的定居牧民而言，牧场上随机分布的牧草中的营养含量将使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四处迁徙，有选择地控制放牧数量的游牧民而言，这却是一种资源。



人们常常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畜牧管理方式，现代化的牧场养殖方式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博茨瓦纳、以及津巴布韦等国牧场养殖和游牧养殖的产出进行比较研究后却得出了一致的不同结论：这些国家游牧养殖的表现不仅均优于牧场养殖，而且，优势还很明显。不论是出肉率、热量值（卡路里）、还是需提供的现金等各个方面衡量，游牧养殖每公顷土地的回报率都要高于牧场养殖。

当牧民拥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牧区中时，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便会加剧，冲突就变成一个无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续性的问题。

区域内牲畜贸易是非洲东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产业，其规模正不断扩大，年产值超过6500万美元（人民币4.44亿元）。该产业的收益取决于牲畜的迁移，特别是跨界迁移。在萨赫勒地区的许多国家中，畜牧养殖占农业GDP总值的40%以上。这些数据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畜牧生产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全部贡献。国民核算是以肉和生皮等最终产品的价值为基础，而忽略了游牧养殖方式在社会、安全、以及生态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当干旱和灾难发生时，牧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迁移。因此，对于牧民而言，保持流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干旱，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农作物生产而言，游牧养殖是当地生产战略的最佳之选的原因。

面临的障碍

游牧民的活动范围日渐受到限制。大片大片的农场时不时地挡住他们通往放牧区的道路；边境管制又妨碍了他们的交易模式；他们过去保留下来作为干旱时期放牧场所的地区现在不是变成了国家公园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农业计划所占用。政府所颁布的政

策也积极鼓励游牧民在其它地区定居下来，并且适应“现代化”的畜牧方式。这些政策的立脚点往往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游牧养殖不仅经济效益低下，而且还对环境造成破坏。人们认为将土地用作它途，如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国家公园等，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并且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这些观点都缺乏切实的证据。

农业是游牧养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家庭农场缓慢而坚定推进。此外，某些地区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建设也正在不断地吞噬大片的放牧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叫停了一些建在苏丹中部半干旱地区的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扩张计划，并警告说，这些项目将在未来成为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苏丹北部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已经由于助长了冲突、环境退化、以及侵犯人权等原因而备受指责。

特别是在非洲东部，国家公园、猎物繁殖保护区、狩猎区及保护区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从而使游牧迁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为这些土地不仅包括旱季和雨季主要的放牧区，而且还切断了季节性迁移的必经之路。设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干达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与苏丹和肯尼亚的边界，严重阻碍了托普沙人从苏丹南部到乌干达北部卡邦地区旱季牧场的迁移。多多斯游牧民同样失去了位于东北部提姆森林的雨季主要牧场。根据卡拉莫贾农牧开发项目的迈克尔·戈德温·万苏斯的研究，这片地区在2000年被宣布划为森林保护区。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较之其它方式，特别是农作物生产，游牧是一种更能够与野生动植物和平共处的土地使用方式。

不论是非牧民还是牧民都开始了圈地。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波拉娜人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富拉尼人以及索马里兰的索马里人，非洲之角的范围内，游牧家庭正纷纷把牧场圈起来。牧群规模缩小所引起的贫困使非洲东部和西部地区数以千计的游牧家庭不得不将牧场土地划分出来从事雨养农业，或者在有水源供给的地方从事旱季农艺。而其他人由于害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用而变得一无所有，或者出于保护牧场不被用于农业或伐树烧炭等其它用途的目的，也不得不圈起大片土地。

具体有多少曾经的牧场被占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少已经被用来种植小麦、甘蔗、灌溉烟草、棉花、高粱、鲜花、以及蔬菜等作物。还有一些成为狩猎场和养牛场、国家公园、以及森林保护区。重要的不仅仅是土地流失的严重程度，关键的是这些土地的性质。大部分被割据的土地关系到湿地或沿河森林等战略性区域的安危。这些地区不仅湿度较高，而且也较为稳定。因此，特别是当旱季，周围

牧场的牧草枯萎贫乏的时候，这里却可以找到营养成分更高的牧草。

这些地区有着肥美的牧草，就像是“逃生的小岛”一样，在下一个雨季来临，重新长出新鲜的牧草之前，让牲口们可以有地方吃饱肚子。失去了这些地区会对整个畜牧系统的收益及适应能力造成伤害。失去这些土地究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新的土地使用体系的预期收益是否会大于取代畜牧业所带来的收益损失，针对这些问题迄今所做的研究非常少。

冲突也是阻碍流动性、改变放牧方式、降低产出、以及加剧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乍得和苏丹两国之间长期的冲突就意味着牧民们出于安全问题的考量不得不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大团体。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么做反而更难找到高质量的牧草和水源。苏丹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同样使苏丹西北部红海州的贝贾族牧民通往主要牧场的道路被阻。牧群无法到达牧场使牧场的使用率偏低，从而导致灌木的生长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当牧民拥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牧区中时，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便会加剧，冲突就变成一个无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续性的问题。

干旱地区的各种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口的迁移。人们一直认为游牧养殖方式是一种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破坏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在这种观点的不断驱使下，非洲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是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体系的动态学知识。而且，牧民团体也没有参与政策的制订。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摒弃这些冥顽不化的看法。

赛德·海瑟：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气候变化小组首席研究员。本文作者还有塞弗里奥·克拉缇里、伊兹·伯奇、及玛格达·那赛弗。

本文的全文曾以图书形式由IIED出版，书名为《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非洲干旱地区畜牧生产的未来》。本文为该书的摘要，经授权在此发表。

图片来自 trends.com.cn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524-Modern-and-mobile-1->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524-Modern-and-mobile-1->

畜牧业的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2)

赛德·海瑟 2010年3月10日

人们一直以来对非洲的游牧养殖方式不屑一顾，认为它不仅落后，而且效率低下。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它具有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赛德·海瑟撰文。

在非洲的许多干旱地区，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游牧以及流动性对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目前，很多创新性的政策得到认同，这些政策反映了游牧在地方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新的举措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

游牧经常需要穿越国界，区域贸易亟待支持，在意识到这些需要后，一些国际机构正着手将跨境游牧迁徙正规化。这为民族国家在制定本国的政策法规时提供了参考依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率先做出表率，为促进跨境牲畜迁移提供了制度框架。跨境迁徙需要取得授权证书，此举在控制牧民离开本国国土的同时，确保了当地畜群的健康。

在过去的15年中，西非国家的政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进展。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等国政府均通过了游牧专项法规以保护游牧区，推动牲畜在本国境内的迁徙以及跨境迁徙。东非也不甘落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的《脱贫战略计划》均认为游牧是一种应该予以支持的生计模式。东非也已经创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游牧议会团体来监督政府出台的政策。埃塞俄比亚的牧民日和肯尼亚的游牧民族文化周目前都已经成为了两国政治议程上的常规项目。

萨赫勒地区的地方分权运动已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议程，它涉及领域包括之前由政府控制的民间团体。在马里、尼日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通过地方政府改革、地方分权和区域化，将包括土地以及提供生活用水、医疗保健、教育等核心服务的核心事务的管理权利进行转移，为游牧民族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实施中带来了希望。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还会影响到他们在很多国家的生活。这些改革说明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和实践的正确性，同时也印证了那些确认牲畜流动性在提高生产力、保护环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科研结论。

在西非，尼日尔的沃大贝族(富拉尼人)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用英语、法语及最近兴起的西班牙语，向更多的人进



行宣传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向大众解释流动性的重要作用。沃大贝族已经对他们传统的部族集会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召开了国际知名的全体代表大会。捐助者、非政府组织（NGOs）及游客都被邀请参加这一文化盛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新兴的新型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七千多年来，牧民们一直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快速地对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

这些创新受多家发展机构的新思维的启发。这些发展机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失败后，现在开始更多地介入到牧区的管理。以水资源开发、动物健康或者牧场管理等问题为主的项目已经被对社会问题、体制问题和治理问题的关注所代替。随着干旱和疾病爆发时各种保护重点游牧资源措施的采用，和平进程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从游牧信贷发放到旱灾保险等一系列的创新举措的实施，市场的重要性也最终得以认可。

为了解决非洲牧场经常出现的资源利益纷争，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建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牧场是“公有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不同的使用者所集体拥有、管理并使用的自然资源；他们同时或轮流使用这些土地，而且使用期限通常不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区域所采用的管理条例必须认可并确保各方利益。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非洲干旱地区牧区干旱的问题，各方投入已达数百万美元。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食品，尽管这些食品挽救了牧民的性命，却没能拯救他们的生计。对许多牧区来说，旱季过后雨水的降临仍然无法让他们重新找回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的牲口在旱灾中死去，他们只能在获得食品援助的镇子中或者镇子周围呆下来。有的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谋生手段，有的则开始从事农活或者木炭制造，而有些人则比较极端的选择了犯罪。

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若干机构共同在东非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保护游牧团体的主要生计资产，他们的这一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为工作提供现金报酬（而不是用食物作为报酬），或者利用私人交易市场对牧群的规模进行有控制的减量等方式，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牧民在2006年的旱灾中成功地保住了他们最主要的种畜群。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这些项目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牧民的生计，这不仅有助于调和救助与发展两者之间常有的矛盾局面，还增强了牧民在旱灾过后的恢复能力。

全球性挑战

与其它土地使用方式不同的是，唯独游牧方式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尽管非洲干旱地区对于气候的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还是对当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预测。目前整个非洲大陆观察到的趋势是，持续的少雨、雨季起始和结束日期的变化、降雨强度的不断增大、非洲不同地区降雨的增多和减少、干旱引发的动荡不断增多等。其中，降雨强度的增大经常会导致洪水，并对农田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这些趋势有可能还会在短期或中期内持续下去。

与那些固守一地的农户相比，游牧民能够更快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七千多年来，牧民们一直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快速地应对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并且采用专门的风险分散策略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免受损失。牧民们能否成功地适应目前的气候变化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环境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牧民的流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为了能够持续的适应气候变化，游牧族群需要掌握未来变化的信息，并参与规划未来。

人们一直指责畜牧业，意指游牧养殖业的沼气释放也是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高调公布的报告，“畜牧业背后的巨大阴影”认为，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有18%源自畜牧业，比交通工具排放的比率还高。然而，当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后，事实就变得很清楚，这些数据是全球家畜行业被合计在一起后的数据。如欧洲的集约化奶厂，东南亚的高密度养猪场，美国的肉牛饲养场和经营牧场，以及非洲的游牧养殖等方式全部被归在一起。在我们对不同的畜牧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就得出结论，认为非洲干旱地区的游牧养殖方式对全球暖化的弊大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以及碳封存的利，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目前，游牧方式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非洲草原的碳封存能力也为干旱地区带来了机遇。非洲发现的草原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根据岗德生态经济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康斯坦萨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草原储存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总存储量的34%，这就相当于每一万平方公里草原能够提供价值7美元（人民币47.8元）的碳储存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化严重、或者是变草为耕的地区，草原储碳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总体而言，牧场和游牧方式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也意识到牲畜的放牧有助于保持野生动植物数量的平衡。而野生动植物才是大部分非洲旅游业发展的基石。在过去漫长的三、四千年里，正是游牧民的土地管理方式塑造了今天东非大草原的地貌景观。良好的放牧方式不仅能够拓展草原，刺激植被的生长、有助于种子的传播和草原多样性，而且还能够通过生态系统增强营养物质的循环。而在那些流动性降低，放牧受限的地区，过度放牧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流动性受到保障的地区，游牧除了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以及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等优点之外，还为非洲各国政府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因为草原将可能成为碳池。一旦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保障，他们便能够自由往来于贫瘠偏远的边境地区，这将有助于减少冲突。而当他们的放牧策略和行为受到保护后，游牧方式还能够有助于实现干旱地区数百万人口的经济独立。否则，除了增加城市贫困和社会动荡之外，他们将毫无选择。

未来政策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游牧养殖方式的许多有益之处加以重视。如果畜牧业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顿之中，那么我们将面临着失去所有这些有益之处的危险局面。因此，失去畜牧业有悖于公共利益。

赛德·海瑟：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气候变化小组首席研究员。本文作者还有塞弗里奥·克拉缇里、伊兹·伯奇、及玛格达·那赛弗。

本文的全文曾以图书形式由IIED出版，书名为《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非洲干旱地区畜牧生产的未来》。本文为该书的摘要，经授权在此发表。

图片提供：周维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528-Modern-and-mobile-2-English-Version:](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528-Modern-and-mobile-2-English-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528-Modern-and-mobile-2->

直面美国触目惊心的教训(1)

朱迪思·夏皮罗 2010年1月28日

朱迪思·夏皮罗认为，在如何对待原住民的问题上美国所犯下的错误是其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中国对此不应掉以轻心。

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经常会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美国西部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大自然的征服不时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运动所效仿的榜样。而西方工业革命后对环境进行的治理又时常成为中国环境危机的挡箭牌。人们寄希望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施加压力，使环境能够沿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轨迹良性发展。

然而，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修复等方面以西方为榜样却很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美国，这样的发展是以严重伤害原住民和环境为代价的，其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挽回的。美国依靠窃取数百万美洲印第安人所拥有的土地和资源才获得了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这些印第安人早在白人定居者踏上美洲大陆前就已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时至今日，法庭上针对这种偷盗行为的合宪性所提出的质疑声依然不绝于耳。而对于美国所谓的正直和荣耀而言，过去两个世纪里遭受巨大伤害的印第安人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其脸上抹不去的污点，同时也是一份沉痛历史记忆。这些曾经的不公不仅依然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同时，想要对其加以纠正也并非易事。希望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新兴经济体应从美国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美国西部开发的主要内容就是动用种种暴行强行迫使美洲印第安人迁居。例如，印第安人不得不于1831年踏上“血泪之路”。乔克托族、彻罗基族、塞米诺族、以及其他一些部族被迫从美国东南部迁往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途中，疾病和饥饿夺去了数千名印第安人的生命。

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很多年里，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有组织地弱化和摧毁成为国家的官方政策。十九世纪中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整个印第安人口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几乎被消灭殆尽。“赏金猎人们”每砍下一颗印第安人头就能获得一笔赏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策略，例如，消灭水牛等印第安人的肉用动物，窃取和捕杀马匹（印第安人狩猎和自卫的交通工具），以及蓄意将天花传染给印第安人等手段。

接下来，当战败的印第安人不得不屈居于保留地之后，又将印第安人的孩子赶入寄宿学校，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自己的本族语言。印第安人



被迫迁居。逐渐地，他们拥有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面积也越来越小，直至他们手中只剩下过去疆土的一小部分。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内容令人心痛纠结。有多少许下的诺言被推翻，又有多少签下的条约被撕毁。正如苏族领袖红云的名言所说的那样，“他们许下很多诺言，多到我都记不住。但是，他们从来都没履行他们的承诺。唯有一个诺言例外：他们发誓要抢走我们的土地，他们已经得逞了。”

希望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新兴经济体应该从美国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这是一个有关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典型故事。政治学家们认为，国家扩张疆土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资源，安置过剩的人口，及维护贸易市场的安全。拉科塔苏族的经历正是如此。随着黄金和铀等新的资源在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被发现，一场围绕着土地和资源的争夺战也随之发生改变。

随着那些寻找新生活的白人定居者从东部汹涌而来，印第安人的命运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红云曾在1870年这样评论道，“我的周围尽是白人的孩子。除了一座孤岛，他们什么也没有剩下。最初拥有这片土地时，我们还很强大。但是如今，我们像山坡上的积雪一样开始融化。而你们却像春草一样郁郁葱葱。”尽管徒劳无益，他还是请求道，“我有Paha Sapa（布拉克山）和大角山两座山头。我希望国父（总统）不要开山修路。”

这也不啻于一场文化灭绝运动。而那些白人，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最了解什么对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游牧民才是最好，然而却将印第安人赶入居留地，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狩猎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么做的结果是导致整整六代印第安人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致使印第安民族传统和自身认知的消亡，以及失业、酗酒、黑帮、萎靡不振、部落领

导权派系丛生、以及对公正和重塑辉煌未曾实现的夙愿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

尽管我可能有些吹毛求疵，甚至是满腹偏见。但是，针对这些指摘，美国最高法院在其1980年作出的判决中裁定对非法侵占布拉克山的行为进行赔偿。而对这段历史的大致描述也为大众所接受。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这段历史。今天，很多印第安人感觉他们是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一群人。

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拉科塔苏族还是被迫迁往美国中西部的南达科他州。2009年5月，我曾经与一群美国大学的学生一道在松树岭印第安居留地呆了一周时间，试图借此找到能够改善当地群众生活的办法。这片面积为13000平方公里的居留地建于1889年，是美国第二大印第安居留地。松树岭的面积甚至比美国东部的康乃迪克州还大，人口估计超过3万。然而，由于很多人无家可归，或者逃避人口普查，因此，官方的人口数据仅为19000。

目前，居留地是美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人均年收入仅为3千美元（20500元）。与发展中国家一样，这里的人民同样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这里的青少年自杀率是美国最高的地区之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婴儿死亡率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0倍；糖尿病和肺结核的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尽管在居留地范围内颁布了禁酒令，然而酗酒现象仍然十分猖獗。失业率高达85%。居留地男性的平均寿命仅为46岁，女性为49岁。很多家庭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在其相邻村镇，以及与之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拉皮德城里，种族暴力事件更是家常便饭。虽然部落政府应当享有“自治权”，然而重大决策还是掌握在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BIA）的手中。

被迫离开故土，并且目睹自己熟悉的环境变得面目全非是导致居留地面临今天这些深层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朱迪思·夏皮罗：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自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生项目主任。

文章配图为土著人居住地的旗帜，由 Sage 摄。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471-Facing-America-s-demons-1->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471-Facing-America-s-demons-1->

直面美国触目惊心的教训(2)

朱迪思·夏皮罗 2010年1月28日

美国的原住民在他们的土地上被白人定居者连根拔起，这使当地的环境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本文第二部分，朱迪思·夏皮罗讲述了其中一个部落的经历。

拉科塔是包括达科他和纳科他在内的苏族分支之一。拉科塔族人曾经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草原和平川。从威斯康辛州到怀俄明州的大角山，北起加拿大，南至堪萨斯州，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不留下他们捕猎水牛的身影。

从部落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中我们能够找到他们的发源地，就在今天南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最后，这些山峦因被白人刻上了四位美国总统的雕像而被称为拉什莫尔山。这些山是印第安人被占领地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美国的司法界依然对此深感懊悔并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拉科塔是苏族最大的分支，其下又分为奥格拉拉族、洪克帕帕族等五个部族。居留地建立伊始，就要求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必须在一个部落登记入册。今天，松树岭印第安居留地是奥格拉拉苏族的领地。

印第安人的传统食物除了低脂肪、高蛋白的水牛肉外，还有野生萝卜、野樱桃及一些种植蔬菜，如玉米、南瓜等。这些蔬菜主要依靠与其他部落进行贸易而得。早期，他们与白人的接触始于皮毛交易；拉勒米堡就是在海狸被猎杀殆尽之后为了便于水牛皮交易而于1834年建立的。法裔皮毛商人们与印第安人通婚后生下混血儿。这些混血儿成为白人与苏族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为他们之间进行进一步富有成效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为了获得他们眼中的美味——水牛舌，武器装备精良的白人开始对水牛进行大规模的捕杀。因此，水牛逐渐开始消失。此举使印第安人大为光火。对于他们而言，动物浑身都是宝。动物给予他们食物、栖身之所、衣物及宗教仪式上的礼品。通往太平洋西北部的俄勒冈之路途径拉勒米堡。而沿着这一路线大批涌入的白人使拉科塔人的主权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

1868年签订的著名条约最终为一系列的战争画上了句号。美国在条约中承认整个南达科他州西部地区（包括布拉克山在内）均属于大苏族保留地。同时，怀俄明州东部地区也是“印第安人不可分割的领土”。除了贸易和政府事务的需要，任何美国人



不得进入这些地区。重要的是，除非全体印第安成年男性中的四分之三签署通过，否则不得对条约进行任何修改。而正是基于这一条款，今天法庭依然对美国随后侵占印第安土地的行为提出质疑。因为文件上同意修改条约的签名数量并不完整。

在推进现代化的旗号下，美国大平原的生态系统被彻底地、无法挽回地改变了。

随着1874年卡斯特将军的远征，这片土地上被探明的黄金储量越来越多。美国试图购买布拉克山。而一场规模巨大的淘金热潮也拉开序幕。然而，由于印第安人缺乏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因此拒绝出售他们的土地。例如，印第安首领黑隼就曾说道，“我的理智告诉我土地是不能出卖的。大神将土地留给他的子孙，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只要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就对其拥有一切权利。除了那些能够被带走的東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被出卖。”

迫于压力，印第安人不得不迁居他处。而由于水牛近乎绝迹，印第安人狩猎更加困难，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迁居。美国军队当时命令所有的印第安人必须前往他们的“事务处”或居留地中心。凡是拒绝前往的都被视为“敌人”。1876年爆发的小大角山战役将保德河附近发生的一系列小规模冲突推上了高潮。这场针对卡斯特将军战争同时使疯马等印第安人领袖闻名于世。这是印第安人最后一场关键性胜利。之后，印第安人的命运急转直下。

1877年，由于政府克扣口粮配给，印第安人迫于饥饿不得不放弃了布拉克山。即便这样，大多数人仍然拒绝在新的条约上签字。最终，条约仅获得了十分之一的签名，远未达到规定的四分之三。到1878年，松树岭以及其他一些居留地已经形成。之后，印第安人被迫签下的协议中允许农民和矿工移民侵占其他印第安土地。

而剩下的支零破碎的印第安居留地也只不过是1868年和平条约中所许诺的领地的一小部分。水牛被捕杀殆尽，昔日青草漫漫及人肩的大草原也因为过度放牧和耕作而变为沙漠。1914年，最后一只候鸽也死在了动物园里。而曾几何时，迁徙中的候鸽遮天蔽日，数日不绝。在推进现代化和建设“新世界”的旗号下，在资源无限的错误观念下，美国大平原的生态系统被彻底地、无法挽回地改变了。

到十九世纪末，当时的苏族印第安人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传统的狩猎生活方式。出于国家对印第安人的法律监管，他们的谋生手段消失了，同时还禁止他们再过游牧生活，使他们完全依赖于政府的食物供给。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或许是由于文化的极度低迷，在一位名叫沃屋卡的派尤特印第安人先知的带领下，一场神秘的预言运动席卷整个印第安人聚集地。在他的预言中，印第安人都应该跳“鬼舞”，借此唤醒死去的先人，让水牛重归大地，让白人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奥格拉拉-拉科塔苏族狂热地信奉这个预言，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种特殊的“鬼衣”。据说穿上此衣将刀枪不入。

1890年，数百名印第安人聚集起舞。这引起了白人的恐慌，并试图禁止这种舞蹈。支持鬼舞的著名精神领袖坐牛最终被杀害。随着紧张局势的升温，一些印第安人逃往巴德兰兹劣地。而在这里，他们遭到了美国第七骑兵队的阻击。最终，首领大脚投降。一行人被押解回松树岭居留地。正当他们在伤膝河安营扎寨之时，枪声响起。由于坚信鬼衣能够护体，印第安人没能很好地保护自己。数百名印第安男人、妇女、以及儿童在大屠杀中丧生。1890年12月29日发生的伤膝河大屠杀被认为是印第安人抵抗白人运动的终结。而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苦难经历和文化认同缺失则由此拉开了序幕。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他们进行“美国化”和强制同化。不同基督教派的善意传教士被派往各个印第安居留地，这样就不会引起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在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任命牧师作为政府代表时，圣公会获得授权掌管松树岭地区（此举偏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秉承着造福于那些可怜的异教徒的信念，他们大肆宣扬自己的宗教，并宣称印第安人是无知的恶魔信徒。印第安人的孩子被他们带出居留地，送往遥远的寄宿学校。他们长长的辫子被剪掉。学校还把他们的父辈是野蛮人的观点灌输进他们的脑海。并且不允许他们在学校里讲拉科塔语。最终，许多印第安人接受了他们的文化是落后文化的思想，并产生了严重的自我厌恶情绪。很多心理学家都将这看做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创伤。

传统政府被印第安人事务局（BIA）所取代。他们雇佣愿意合作的奥格拉拉人来帮助白人执法。尽管土地应该被分配给印第安人，然而，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因为印第安人缺乏土地所有权的意识，大部分土地一点一点地从他们手中被骗走。而后代人的索权使土地保有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历史再一次发生了扭转。1934年颁布的《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允许部落制订自己的宪法，停止印第安人事务局对当地文化的压制。然而，这一政策却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临时推行“终结政策”，鼓励印第安人结束部落生活，离开居留地，搬到美国的其他城市。只有少数印第安人具备在异乡生存所必须的技能，大多数最终还是回到了居留地。

由于完全依赖政府，今天的印第安男性身无一技之长。家庭成员也没有出去谋生或工作的传统。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相对贫瘠，而且自然资源匮乏；矿产资源丰富的布拉克山也落入他人之手。而且，在苏族人的传统观念里，在任何情况下开挖土地都是不允许的。部落政府手中没有实权。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勾心斗角、腐化堕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名为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武装组织与当时负责治理居留地的腐败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他们行进到华盛顿，占领印第安人事务局长达数日。而回到居留地后，1973年在伤膝河大屠杀的旧址前展开的与联邦警察长达4个月的对峙终于让他们放下了派系间的争斗。但是，直到今天，对于这次事件的苦涩记忆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脑海。

1975年通过的《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允许印第安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其中包括组建自己的警察队伍和掌管学校等。同时，根据1868年的条约，有关土地索权案的诉讼一路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80年做出裁决，判定印第安人有权就被侵占的土地获得赔偿以及相应的利息。法庭宣布的初步赔偿金额高达1700万美元（1.16亿元）。加上利息，其现值超过4亿美元（27亿元）。

然而，苏族人却拒绝接受赔偿。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土地不能够用来出售，并且认为自己的代理律师没有尽到其代理人的职责。直至今日，很多拉科塔人依然要求按照1868年条约将布拉克山归还给他们。他们依然不懈地通过法律和外交渠道希望拿回他们的土地。

朱迪思·夏皮罗：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自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生项目主任。

文章配图来自网络《西雅图酋长的宣言》

直面美国触目惊心的教训(3)

朱迪思·夏皮罗 2010年1月28日

在这篇关于印第安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朱迪思·夏皮罗敦促中国在开发其土地的过程中要对美国曾经的错误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

强制拉科塔苏族从他们的土地上搬迁的历史虽然时过境迁，然而对于居住在居留地上的印第安人而言，直到今天，这段历史却依然鲜活于他们的脑海。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能滔滔不绝地向你讲述他们的父母如何被送往遥远的寄宿学校，如何被灌输他们的文化是低劣文化的思想。对拉科塔文化和语言的禁令直到1971才被解除。很多仍然在世的成年人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这些人所经历的文化重创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他们看不到自己未来，对国家的命运也缺乏清晰的认识。我在松树岭印第安居留地度过的一周里，所到之处，人们一遍一遍地向我讲述1868年条约，伤膝河大屠杀，还有侵占拉科塔人眼中的发源圣地——布拉克山。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外界，尤其是对白人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我也在一些居民身上看到了一种挫败感。其程度要远甚于我在世界其它相对不发达国家人民身上所看到的。

如今，居留地唯一真正兴旺的企业就是一间名为草原之风的赌场（印第安人不受国家禁止聚众赌博的法令约束）。十分不幸，那些输钱的人中很多都是印第安人自己，这一点丝毫也不令人意外。有传言说要在哪里发展风力发电；然而至今，这些流言蜚语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结果。还有人说，这里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然而，印第安人不会允许星罗棋布的矿井像伤疤一样留在他们神圣的土地上。而说到“环境不公”，离居留地不远新开采的铀矿井使下游印第安人的河流面临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危险。

虽然希望尚存，但是却为数不多：两个印第安兄弟受命领导巴德兰兹劣地国家公园和拉什莫尔山。在距离总统像几英里的地方，人们为伟大的印第安勇士疯马竖起了一尊雕像。布拉克山一个神圣的山峰，熊丘，在印第安人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时，禁止非印第安人进入。然而，这里的宁静早已被附近经营的打靶场所打破。而酒吧、露营地以及表演场等设施更是严重地侵犯了当地的部落。

印第安人居留地已经开办了一所大学——奥格拉拉-拉科塔学院。学院开设了拉科塔研究、护理、商业、信息科学、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高级学位。此外，还设立了“拉科塔基金”用于为珠饰品及其它传统手工艺品小型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一些曾经为了继续深造而离开居留地，或者前往其它地方学习技能的人也重新回到故乡，为家乡的发展做出他们的贡献。

「水牛、候鸽、和高草草原
从美国中部消失之后，取
而代之的是荒漠和沙尘暴。」

同时，为了铭记历史上我们所犯下的大错，经国会立法决定，1989年建立了华盛顿印第安人博物馆。博物馆由印第安人管理。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依然坚守在这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是否会督促国会重新审议布拉克山的归属问题，我们能否采取一些象征性措施来帮助苏族人民从过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那么，我们应当从这些触目惊心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决策者而言，他们可以借鉴些什么呢？首先值得我们深省的是资源、土地、国家建设以及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如何在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公平权力的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而有时则需要我们本着诚实的态度进行深刻的反省，是否我们正在利用我们的文化优越感和双重标准来为我们侵占他人土地进行开脱。在本例中，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资源的开采，然而却被常常披上了造福于印第安人的华丽外衣。

其次，好心有时却能干坏事。美国传教士和文明人打心眼里相信禁止拉科塔语和拉科塔风俗是一件正确的事。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甚至有可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让他们能够在天堂拥有一席之地。然而，剥夺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对印第安人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印第安人通过恢复一些太阳舞这样的宗教仪式来找回他们的传统，并在一些印第安人的学校里重新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

第三，枪支、公路及铁路等现代技术，还有天花等外来疾病对印第安人具有很强的破坏力。这一切让竞争无公平可言。如此一来，印第安人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便微乎其微。正如环境历史学家贾德·戴蒙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告诉我们的那样，技术、疾病以及引进物种与传统的军事优势一样，能够影响文化碰撞的结果。

第四，人类文明和资源开发的惨重代价之一往往就是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发生改变。水牛、候鸽和高草草原从美国中部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荒漠和沙尘暴。情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为严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过度放牧和耕作所付出的一个沉重而长期的代价。

最后，尽管原住民所掌握的知识常常不被现代“科学”所了解和重视，然而在如何与土地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它们却往往能够为我们指明道路。虽然一些人曾提醒我们警惕印第安人智慧中的理想化成分，并且称“生态印第安人”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族长老们就曾经预言，白人们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将会导致一场生态浩劫。

我希望这个松树岭的苏族预言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讨论。尽管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异，我们之间仍有很多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当两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相似之处不断增加，我们更应该相互借鉴。

朱迪思·夏皮罗：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自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生项目主任。

文章配图来自 club.sohu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476-Facing-America-s-demons-3->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476-Facing-America-s-demons-3->

共同管理：源自蒙古国的可持续草原之路(1)

罗尼·魏努力 2011年12月6日

罗尼·魏努力指出，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给亚洲腹地的游牧社区造成了负面影响，然而共同管理方案是一条解决之道。

蒙古国是一个平野千里、蓝天无际的国度。该国百分八十的国土都是草原，马、牛、绵羊、山羊、骆驼等牲畜的总存栏量达到3500万头，270万人口中有一半都靠畜牧业生活，产值占到该国GDP的20%。从上面这一连串数字可以看出，游牧是蒙古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牧民们就像谚语里所说的，“跟着我们的畜群”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他们的蒙古包可以随时搭建、收起、再建，游牧让他们完全依靠自然的恩赐生活。

但是，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威胁。十年前，蒙古国的牧民们已经开始观察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风暴、干旱和雪灾等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增加。2010年的雪灾（蒙语“zud”）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雪灾之一，造成约850万头牲畜死亡，占到2009年蒙古国全国总存栏量的20%。这一年总共有77万牧民受灾，其中4.35万人的牲畜全部死亡，16.4万人的牲畜损失过半。尽管有早期预警信息，但无论牧民还是蒙古国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这场灾害。

蒙古2009年的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总结出许多主要趋势，比如：从1940年至今，该国的年均温度升高了2.14摄氏度；冬季降水量增加了，暖季降水量则稍有减少。最近的气候变化研究对本世纪的趋势作出预测：冬季将更温暖、降雪量更大；夏季将更炎热；年均降水量将增加20%；严冬等异常天气现象将成家常便饭。因此，完全靠天吃饭的游牧产业将会更加脆弱。

但是，游牧业脆弱性增加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过度放牧也是自然资源退化的一个元凶。过去四十年，蒙古草原的生物量减少了30%。与此同时，覆盖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在不断扩张，平均每20年向北侵袭150公里。如果你进行一次穿越蒙古国中部的旅行，一眼就会看出这个正在发展的沙漠化进程，短短几年前还是牧场和农田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满目黄沙。

过度放牧的起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式农牧业控制模式的解体，当年土地和牲畜都是由公社体制管理的。公社取消后，土地仍然是国有，但牲畜都私有化了，这让牧民有了扩大畜群的强大动力。由于这一趋势，再加上20世纪末连续几个温暖宜人的冬季，蒙古的畜群迅速增长到创纪录的3000万头。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过度放牧和牧场退化。



尽管蒙古全国的经济在繁荣发展，但从2006年开始农村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交通、通讯和金融）仍然非常落后甚至凋敝。

面对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和蔓延的气候变化影响，单独的家庭和社区是无力应付的，我们需要更高层面的联合行动。

蒙古国政府开始对牧民们及其生活方式面临的威胁作出反应。在该国很多地区，牧民们与地方政府和研究者合作，在许多新政策措施和法律的支持下，正在进行“共同管理”的试验，这是一个旨在提高社区恢复力的适应性管理形式。这一概念在蒙古国学者兼活动家H Ykhanbai的推动下变得广为人知。

从上世纪90年代蒙古的草场明显退化开始，Ykhanbai就努力探寻一种既自上而下又自由放任的发展策略。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来说，Ykhanbai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独一无二：他在遥远的阿尔泰山一个牧民家庭中长大，后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留学，分别研究过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和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他认为蒙古的牧场是由许多用户共享的共有资源，但牲畜的私有制让牧民们变成他们自己产业的真正管理者。因此，对畜群的可持续管理要依靠两个因素，一是牧场的承载能力，一个是依赖同一资源的相邻牧民间的互动。

用Ykhanbai的话说：“我的这个知识是从童年的牧民生涯中得来的。牧民和地方政府在牧场资源可持续管理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其它利益相关者在各个层面上的参与来弥补。各方合作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库。面对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和蔓延的气候变化影响，单独的家庭和社区是无力应付的，只能依靠更高层面的联合行动。”

罗尼·魏努力，农村发展社会学家，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有深入研究。本文最初刊登于《解决》杂志，本站经授权转载。

共同管理：源自蒙古国的可持续草原之路(2)

罗尼·魏努力 2011年12月6日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罗尼·魏努力介绍了游牧民如何让他们社区转型。他指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在Ykhanbai的努力下，牧场资源共同管理方案在上世纪90年代末首次在蒙古国全国多个地方进行了试点，试点的范围很广，覆盖了干草原区、森林草原区和阿尔泰山高山区。共同管理的效益非常惊人。让我们以一个牧民社区为例详细了解一下。依克布拉社区位于后杭爱省的中央干草原和森林地带，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280公里处，属赫吞特县（Khotont县，关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对蒙古牧民的影响，请参阅本文第一部分）。赫吞特县面积2200平方公里，人口4400人。社区坐落在一个面积约450平方公里的较小山谷里，周围被丘陵和杭爱山脉的群山所环抱，一边是针叶林，另一边则是荒凉的废地。地名中的“依克布拉”意为“泉水”，来自曾经流淌在这个地区的20多处清泉，但如今大多数已经枯竭。发源于别尔哥丘陵（Berkhe）的小依克布拉河从山谷中穿过。当地牧民的祖先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山谷定居，为的就是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水源和牲畜的牧场，同时也看中了这里能让他们在严冬里躲过寒风和暴风雪的侵袭。

这个地区现在居住着约30户游牧家庭，他们在山谷内外的四季牧场上轮番放牧。社区成员散布在山谷各处，组成了多个蒙古包群，每处有两到八家，他们之间都是近亲属关系。这些家庭在冬春两季聚在一起，住在山谷的营地中，搭建起简单的畜棚。夏秋两季则追逐着新鲜的水草四散到邻近区域，向东顺着塔干苏敏河（Tsagaan Sumiin）到阿加尔加兰（Arjargalant），向西到鄂尔浑（Orkhon）。

赫吞特县的第一个共同管理团体2001年在阿加尔加兰建立，就在依克布拉的旁边。2002年，在阿加尔加兰经验的启发下，依克布拉的约30户牧民也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共同管理团体。牧民们给出了好几条参加的理由，包括协作劳动、加强组织的需要，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计等等。共同管理团体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希望在一起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根据蒙古国《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条例》，社区就牧场利用与县政府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共同管理协议，这个协议在2006年生效，2010年更新。在协议中，各方就季节性牧场和森林的边界达成一致，并在地形图上标注出来。对保护和使用权的所有管理措施和责任都被移交给社区，协议每年要审议一次，如果所有参与方都认为有必要的话，要进行重订或调整。这个共同管理进程的核心就是为利益相关者界定出明确而有效的角色和责任。这里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的牧民、地方领导人、



国家（由地方政府以及自然环境和旅游部等中央部门工作人员所代表）。

自从依克布拉社区(Ikhbulag)的牧民家庭开始进行共同管理及其相关活动的实践，不仅提高了生产知识和技能，也增加了家庭年收入。

依克布拉的牧民们解释说，他们的努力是应对近年来多次遭遇的气候变化的一个办法。他们发现这个地区比以前更干旱，过去十年里，每年降雨不到10次，而其中2002、2003和2009年旱得最厉害。许多河都干了，社区周边35英里之内都没有大河。一位牧民说：“二十年前，草高得能没过小牛，但现在刚刚能盖住地皮。牲口吃不够草，长不足膘，难以度过严冬。如果下暴雪，牲口就更容易死亡。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在旱季把矮草都吃光了，冬天到来时剩下的草就不够吃了，如果下暴雪，许多牲口就会死亡。”2010年的大雪灾就上演了这一幕。

为了应对灾难，社区成员们同意实施一些新举措：共同准备越冬的干草和饲料；减少牲畜数量，提高质量（比如专业的繁育员帮助牧民改善山羊的种质）；提前进入新营地，让遭到严重退化的牧场有更多时间恢复；建起更好更多的畜棚；收入来源多样化；种植马铃薯和蔬菜。依克布拉的妇女们在共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过去几年里，她们在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变得更加坦率和积极，在对社区管理进行参与式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并建立起一个社区妇女团体来鼓励手工艺品制作等创收活动。她们还向共同管理团体的其他成员展示自己的技能，并积极参与每年一度的社区产品展览。最近，她们还支持建立了一个出售当地产品的社区商店，这样要比通过中间商的方式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根据Ykhanbai和他的研究团队所做的一项评估，依克布拉的牧民家庭开始进行共同管理及其相关活动的实践后，不仅生产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家庭年收入

入也增加了。收入增加非常稳定，每年5%到10%不等。他们还发现那些被划定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年增长率要更高一些。这说明，对于那些在蒙古国过渡时期受难最重的家庭来说，共同管理的努力已经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根据蒙古国的新《环境保护法》（2005年）和第114号部长令（2006）关于“自然资源保护、优化使用和配置的社区规定”，共同管理方式将推广至蒙古国的所有省县。尽管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但共同管理已经被证明是应对牧民面临的各种威胁的有效策略。在蒙古国这样的经济过渡型国家，共同管理方式的落实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明确的条文来弄清在对（社区）协议的支持上，政府会做哪些，不会做哪些。以社区为基础的牧场管理实践已经对试点研究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牧民生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试点社区、甚至近来这些社区以外的牧民都开始更加关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抵御沙漠化和气候变化。对于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自然资源退化来说，共同管理十分重要，因为这种方式把当地人作为其自身发展中的关键社会单位。

在这方面，蒙古国可以为其它国家树立一个有启发性的榜样。正在经历类似过渡进程的中亚邻国们已经开始从蒙古国学习经验，以避免其自身的“公地悲剧”。研究者们正在努力把蒙古国的共同管理实践用在中亚那些定居性更强的畜牧社区。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几个村子里，曾经属于国有农场的农牧民在地方政府代表的参与下聚在一起，建立起小型的管理团体，共同规划可持续的畜群管理方式，同时还保持资源的私有。Ykhanbai答应了研究者和牧民们的邀请来帮助他们。中国同样可以从中学学习一二。中国草场私有化策略（划包成片，围栏围养，集约化的草场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在一些人提出要从政策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改革：拆除围栏；杜绝集约化的土地使用（如垦草种粮）；变私有草场为公共牧场进行共同管理。

共同管理方式的实施需要时间和努力，一旦建立起来，它就能够成为创新的驱动器。永远敢于探索新天地的蒙古牧民，已经为我们指出了道路。

罗尼·魏努力，农村发展社会学家，专攻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本文最初刊登于《解决》杂志，本站经授权转载。

图片提供：舒泥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667-Mongolian-herders-show-the-way-1->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668-Mongolian-herders-show-the-way-2->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667-Mongolian-herders-show-the-way-1->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668-Mongolian-herders-show-the-way-2->

开发与保护之困

这是在以上主题之外的两篇关于草原的文章。《“保护草原”新政策将令蒙古铁蹄马灭绝》讲述了蒙古马这种草原上生态最和谐的动物，在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处境。保护铁蹄马的行动源自于地方政府以保护生态为目的的一项新政策，由于牧民的自发保护，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旅游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经济的开发方式，但《坝上草原的旅游之痛》却告诉我们，不当的旅游开发，尤其在生态、文化脆弱地区，会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保护草原”新政策将令蒙古铁蹄马灭绝 46
周维 2010年11月23日

坝上草原的旅游之痛 48
周维 2011年6月17日



图片提供：常青、周维

“保护草原”新政策将令蒙古铁蹄马灭绝

周维 2010年11月23日

内蒙古一项保护草原的新政策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让蒙古铁蹄马这种象征古老文化的稀有品种走向灭绝。周维采访了两位试图拯救他们的当地牧民。

2010年11月12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两位牧民上书当地政府，请求保护当地蒙古铁蹄马和马文化。因为在当地政府的一项新政策下，蒙古铁蹄马将很快灭绝。

事情起源于今年3月，为了“保护草原”，克什克腾旗政府要求牧民对马和山羊全年禁牧，此后各地基层政府纷纷发文规定时限，要求牧民处理自家马匹，保护草原植被。

听到这个消息，牧马人出身的宝音达来和阿拉腾紧急借贷，赶赴白岔沟抢购铁蹄马。在他们眼里，铁蹄马不仅与破坏草原无关，而且承载着克什克腾草原骄傲的文化和历史，是最不能缺少的家畜，是他们的朋友。

今年8月，笔者到克什克腾旗探望宝音达来和阿拉腾保护的铁蹄马。白音敖包山下的草原上，秋草微黄，树丛掩映。远远的一小队马群绕过交错的网围栏卷尘而来，跟在队尾的宝音达来骑在马上，一手掂着套马杆，显出平日少有的威风气质。临近嘎查（村）来“串门儿”的牧民闫军说，草原上奔腾的马群，以前在他们这里是常见的，近些年连这十多匹马的马群都少见。为了这十多匹马，宝音达来和阿拉腾付出了血本，其中7匹是他们赶在白岔沟草原政策实施前，用6万元高利贷紧急从买来的。

克什克腾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西北部，与锡林郭勒盟接壤，是一片雨水丰美、地形多样的风水宝地，它临近北京和蓝旗上都，拥有深厚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白岔铁蹄马就是这灿烂文化的代表之一。许多文献和传说表明，铁蹄马是元末逃亡的克什克腾（蒙语意为轮班，为成吉思汗的警卫军）部队留下的战马。这种马体质坚硬小巧，善于行走在碎石路上，因此得名。因为铁蹄马原产于克旗南部地形复杂的白岔沟地区，所以多称“白岔铁蹄马”，也有称“白岔马”，它们是常说的蒙古马的一种。现在，已成为汉化农区的白岔沟，还保留着种群较为纯正的铁蹄马。

蒙古马是喜欢自由奔跑的社群动物，无论是禁牧（即禁止放牧，将家畜圈养）还是留下用于劳力，都意味着这种数量稀少的铁蹄马面临灭绝威胁。



中国马业协会秘书长、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芒来教授告诉“中外对话”，真正的蒙古马只有四个类群：乌珠穆沁白马、乌审马、阿巴嘎黑马、百岔铁蹄马。1975年，内蒙古有马235万匹，现在只有50多万匹，且每年以5-6%的速度下降。现在的50多万匹马中，真正的蒙古马不到10万匹。“铁蹄马是现存蒙古马中最小的类群，只有几十匹左右了。如果不保护，马上就绝种了！”

「现在草原不断退化，这不是牲畜采食造成的，而是牲畜反复践踏造成的，是网围栏造成的。」

50岁的芒来出自蒙古草原牧民家庭，他自小骑马放马，对于蒙古马的急剧减少有切身体会。他说，随着机械化和现代交通的普及，人们对马的需求越来越少。另外，上世纪80年代草畜双承包之后，各个嘎查（蒙古牧区村落的意思）按人平分牲畜，“我们嘎查当时有二千多匹马，例如每人分三匹马，一家有三口人，就可以分到九匹马。但是草原上养马是大群放养的，管理技术要非常专业。分到马以后，有些牧民养不了，就卖掉了。马匹数量急速下降。”同时，草场承包到户之后，每家每户都建了大量网围栏。蒙古马是半野生的家畜，需要大面积的草场自由放牧，很多牧民家庭没有足够的草场养马，只能将马卖掉。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海山教授说，草原五畜（指蒙古马、骆驼、牛、山羊、绵羊）在蒙古草原上已经有百万年了，它们和草原是共存的整体。马在草原五畜中是生态的灵魂，在游牧时代，马是带动游牧的，因为它喜欢喝最清澈的水，吃最清新的牧草，不会在一个地方呆很久，这就保证了整个浩特（牧民和牲畜组成的社群）能够有规律的迁徙，保证了牧草的再生。现在草原不断退化，这不是牲畜采食造成的，而是牲畜反复践踏造成的，是网围栏造成的。老牧民说过一句话：“草这个东西是吃不完的，是踩完的。”蒙古草原是非常脆弱的

生态系统，正是游牧机制使它维持了几千年。现代生态学却把五畜和草原对立起来，错把游牧当成不友好的生产方式。

在牧民心中，马是非常崇高的动物，它智慧，忠诚。宝音达来说，马是蒙古文化和牧区交流的核心载体，套马、驯马、打马鬃是劳动，也是牧民的交流、合作和娱乐。在一次赛马会之后，牧民们会兴致勃勃地谈论一年。在蒙古诗歌和歌曲中，有很大部分是关于马的。阿拉腾说，蒙古族牧民虽然很多没有现代知识，但看到一匹马就知道它是什么品性，应该怎么培养。“现在很多人换了摩托车，关于马的事情，像马鞍子、马嚼子、缰绳这些东西，很多年轻人不会做了，我一直在教他们。”去年他和宝音达来自费举办了马文化那达慕大会，成立了克什克腾旗马文化协会。60岁的阿拉腾平静地说：“我想把这个优良品种保护下来，给子孙后代留一些东西。”

近年来，中国马业协会开始积极保护蒙古马。芒来教授说，除铁蹄马之外的三种蒙古马得到了“蒙古马保种基金”的保护。中国马业协会已开始对铁蹄马的物种特性进行鉴定，有望将之列入保护计划。

牧民们在北京NGO“天下溪”和“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帮助下，给各级当地政府寄了一封申请信，他们在信中说：“草原快速退化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而草原上万马奔腾已经上百万年，所以把草原退化的责任推给蒙古马是非常不公正的。”“今天草原退化不是由于马多了，恰恰是由于马太少了。马群是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臣。如果想恢复草原，不仅要保护马群，还要实行现代游牧制度。这是保护和恢复草原的唯一出路。”

周维，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图片为铁蹄马回归草原，由周维提供。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958-Riding-roughshod-in-Inner-Mongolia>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958-Riding-roughshod-in-Inner-Mongolia>

坝上草原的旅游之痛

周维 2011年6月17日

近十年来，草原游的确让北京周边草原区域的居民钱袋鼓了起来，但是也恶化了当地环境。为此，周维到大滩镇进行了考察。

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记得前些年大大小小的坝上草原旅游广告：到离北京最近的草原，逃离喧嚣，享受夜晚的清涼，骑马、烤全羊……坝上草原年年吸引着北京本地和外来的旅游者，曾是为人熟知的京郊旅游热点地区。

但近年来，坝上草原旅游慢慢降温，公共场所的旅游广告见不到了，有些人已忘了有这个地方，有些人提到坝上草原会说那里“不好玩”了。

可是，那里为什么“不好玩了”？旅游给当地造成了什么影响？在北方春季的一个大风天气里，我们踏上原先的旅游路线，去探访旅游风潮过后的坝上草原。

从北京出发向北，穿越八达岭，翻过燕山山脉的层峦叠嶂，就到了蒙古高原的南沿。当地人为了区别山势海拔的变化，称山岭北部海拔抬升的部分为“坝上”。坝上在北京北部从东到西绵延350平方公里。位于河北省丰宁县的大滩镇是坝上草原旅游最热的地方。这里号称离北京最近的天然草原，不到300公里的距离，平均海拔1486米。

我们的汽车上了“坝”，奔驰在草原的大路上，道路两旁的度假村、农家院接连闪过车窗，粉刷的白墙、醒目的英文彰显着各自的特色。与旅游建筑相应的，是大滩镇和周边村落的破败。短短的两段砖石路深处，是农村小院和脏乱的土路。用来给客人租骑的马拴在路边或院子里安静地吃草。干净、气派、临街的房子通常挂着“农家院”的牌子。还没有开始旅游季节的大滩镇显得有些空荡和寥落。很难想象这里是发展十多年旅游经济的地方。

北京人赵先生1998到2007年曾在大滩镇扎拉营村投资“农家院”，亲眼见证了那里的十年变迁。1998年，喜欢摄影的赵先生到坝上采风，被草原的美景和文化风情深深吸引，与朋友在当地投资开了一个农家院旅游点。赵先生回忆，丰宁坝上最早开发旅游是在1997年6月，他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里真正的旅游度假村只有一家。到赵先生投资旅游点的时候，已是第一批旅游开发的尾声。短短一年内，就有20多家风情旅游度假村开业。

2002-2003年左右，双休日、自驾车开始走进北京大城市人的生活，二日游、自驾游火起来，坝上成为



人们首选的踏青、避暑圣地。据说只有北戴河与之相当。当年开旅游大巴的司机常常辗转于北戴河、北京、坝上草原之间。

「我们在走访的几个村外都看到大片的垃圾坑，坑里的垃圾混着渗水，塑料袋四处飘飞。」

从2002年到2006年左右，每到夏秋旅游旺季，游客常常爆满。赵先生说，老乡们了解各家生意好坏常常看马。如果马都外出了，院子里停满了旅游车，说明生意好；如果马拴在门口，院子里没什么车，说明生意冷清。赵先生所在的村马匹最多时候达到六、七百匹，生意好的时候马常常不够用。在草原风情旅游项目中，烤全羊是吸引人的必选项。一些宣传网站上也看到整只悬挂的烤羊照片。在坝上每个接待客人的院子里，都有烤羊的铁架子。每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农家院、度假村门口聚集着从外面来的羊贩子，他们用车拉着活羊推销出售。旅游最旺的时候，一个村一晚上能吃掉200只羊。

在旅游开发的头几年，投资两年就能回本。据赵先生查询到的大滩镇统计数据显示，1995-96年当地人均年收入1000元，到2005年已达到5000元。在大滩镇开农家院的王女士说，搞旅游比种地挣钱，种地只够全家人吃饭，旅游却能挣到钱。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当地人开发旅游之后，竞争激烈起来，收费标准一度比着降低。“来人就挣钱”的观念驱使着当地跟风似的旅游投资。遗憾的是，后来投资的人几年都无法回本。在连续几年的无序竞争之后，大多数外来投资者走了，北京旅行社的合作项目撤了。人们在北京，再难见到丰宁坝上旅游的广告。

而当地人却承受着旅游带来的不良后果。

“来骑马的人多了，草原不好了。”这是人们直接的感受。不光是当地人，连前些年去旅游的人也能感觉到“坝上不美了”。当地有一种俗称旱马莲的

草，据人们说草原不好的时候就会长起来，而现在有的地方遍地都是。

我们在走访的几个村外都看到大片的垃圾坑，坑里的垃圾混着渗水，塑料袋四处飘飞。赵先生说，一般大型的“农家院”在旺季时期每周能有200多人，一天产生的垃圾能装满3汽油桶。而他们一个村就有五、六十家大小不等的农家院和度假村。

几乎每个农村地区都有定期的集市。赶集是远近村民信息交流和物资交换的活动。大滩镇的集市在每年7月，正是旅游高峰期，赶集的人除了村民还有游客。赵先生说，以前的集市上有许多城市滞销品，北京客人来的多了以后，村民们对商品的口味提高了，也要买城里的那些东西，于是现在滞销品不见了，大滩集市却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大市场。更糟糕的是，集市的面积年年扩大，等到集市撤走之后，那片地方就成了一片大垃圾场，从不清理。

旅游人口的压力还带来隐形的环境问题。位于大滩镇河流下游的村民普遍反映，这两年的地下水变味了，以前6-8米深的井水很好喝，现在已经不能喝了。当地小卖部老板张先生介绍，农村房子下面用于过滤污水的渗井承受不了过多人口的用水压力，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他们村位于旅游密集的大滩镇下游，对此感受更深。

旅游加快了当地建设，仅赵先生所在的扎拉营村，旅游开发的10年，面积扩大了两倍多。然而许多房子冬天闲置，夏天爆满。公共道路、设施并没有得到改观，综合规划和管理严重缺乏，但旅游管理部门仍一分不差地从老百姓租马收入里收取管理费。

这些年，村子面积扩大了，有钱人来得多了，地价和物价高了。“旅游开发，苦的是贫穷百姓。”对大滩有十年感情的赵先生痛心地说。张先生说，旅游让“一部分人富了”，但更多的穷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如今反要支付更高的生活开销，承担环境代价。“这里不好玩，北京人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旅游。这里的老百姓却要永远留在这。”张先生说。

我们向中国草原专家刘书润先生了解到，丰宁坝上是北京滦河的源头地区，也是北京地区沙尘暴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北京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曾是最好的草原。尽管草原退化有着移民、开垦等众多的原因，但十几年旅游开发给一个生态脆弱地区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

去年10月，北京到丰宁的道路重新修整完成，据当地人说，交通便利了，客人会来得更多。又一个草原旅游高峰期就要到来了。

周维，“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孟斯对此文亦有贡献）

图片为坝上草原村落边缘，由周维提供。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57-Bashang-s-tourist-trai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357-Bashang-s-tourist-trail>